

# 新朝的瑞應——以明太祖瑞麥、 嘉禾、甘露之詔諭詩文為中心

連文萍\*

## 摘 要

瑞應，又稱祥瑞，乃吉祥的徵兆。明太祖立國前後迭見瑞應，呈顯政權稟承天授，冀得人心順服。另一方面則曉諭臣民，傳達不輕信、不居功的態度，尤注意災、祥一體兩面，深有戒慎自省。其瑞應詩文以詠嘆瑞麥、嘉禾最多，顯示以足食為先的治國理念，關心農事民生及邊境屯政，以求國祚永保。又記錄採集甘露、賜飲，營造君臣和諧、盛世太平的氛圍。其瑞應觀點影響深遠，後世君臣各取所需的加以詮解，曾被用為明成祖獲取皇權的認證，也被視為勤民、謙德、禁諂諛、弭災異的典範，期請君王敬天法祖，皆已成為明代宮廷政治文化的鮮明印記。

關鍵詞：明太祖、祥瑞、瑞麥、嘉禾、甘露

---

\* 東吳大學中國文學系教授。

# **Auspiciousness for the New Dynasty — Focusing on the Images of Rui Mai, Jia He and Nectar in Ming Tai Zu’s Edict Poetry**

Lien, Wen-Ping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Soochow University

## **Abstract**

The so-called “auspiciousness” includes special natural scenes, such as five-colored clouds, clear rivers, and nectar, as well as rare animals and plants. Throughout the rise of Ming Tai Zu, he used the traditional cultural significance of auspiciousness to emphasize his authority was given by nature and hoped that the people would obey. He praised auspiciousness in poetry and prose, with Rui Mai and Jia He singing the most. These descriptions show that he will ensure the food supply is adequate in the governance and he care about the sufferings of people's livelihood. Furthermore, he recorded the auspicious nectar, to create a harmonious and peaceful scene. His auspicious view had a profound influence. The later emperors and ministers took what they needed to interpret and applied it and regarded it as an example of diligent people. Hence, the auspicious writing became a distinct mark of Ming Dynasty court culture.

**Keywords: Ming Tai Zu, Auspiciousness, Rui Mai, Jia He, Nectar**

# 新朝的瑞應——以明太祖瑞麥、 嘉禾、甘露之詔諭詩文為中心\*

連文萍

## 一、前言

瑞應，又稱祥瑞、禎祥，乃吉祥的徵兆。王充（27-約 97）《論衡》謂：「瑞物皆起和氣而生，生於常類之中，而有詭異之性，則為瑞矣。」<sup>1</sup>包括奇特自然景象，如五色雲、景星、甘露、醴泉，以及珍稀動植物，如鳳凰、麒麟、白兔、嘉禾、連理木。《禮記·中庸》云：「國家將興，必有禎祥；國家將亡，必有妖孽。」<sup>2</sup>自先秦以來，瑞應即為國家興亡表徵，演為政治儀式與文化傳統，由發現、進呈、稱頌到昭告天下，標榜著君主道德治術與盛世太平，已成為現今學界關注的命題，<sup>3</sup>如學者石守謙即指出：「類似嘉禾的這種祥瑞，從地方進呈到公告天下，至遲在北宋時已形成定制。所謂的『繪圖』即指公告之時所備齊的資料，包括一幅對祥瑞的圖畫記錄（圖），一篇對祥瑞出現時間、地點和情況的描述（記），以及一篇針對政治象徵意涵加以闡釋的儀式味道濃厚的韻文（贊）。」<sup>4</sup>瑞應與政治、文學、藝術等多方連結，值得深入

---

\* 本文為國科會（原科技部）補助專題研究計畫（MOST 108-2410-H-031-044-MY2）的研究成果，感謝匿名審查委員的指正。

<sup>1</sup> 漢·王充：〈講瑞篇〉，《論衡》，收入《文淵閣四庫全書》子部第 862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卷 16，頁 202。

<sup>2</sup> 宋·朱熹：〈中庸〉，《四書集注》（臺北：學海出版社，1982），頁 21。

<sup>3</sup> 綜論古代瑞應，如胡德生：〈中國吉祥：中國古代祥瑞觀念的興起、演化和主要門類〉，《紫禁城》163（2008.8），頁 76-119，論述祥瑞崇拜文化起源發展等。討論瑞應圖像，如劉潔：〈漢代祥瑞文化與「天人感應」說之關係〉，《文博》2009：4（2009.7），頁 53-58，考察漢代石刻黃龍、白鹿、甘露、嘉禾、木連理。

<sup>4</sup> 石守謙：〈元文宗的宮廷藝術與北宋典範的再生〉，《中國文化研究所學報》65（2017.7），頁 100。

探索。

明太祖朱元璋（1328-1398）出身民間，因緣際會取代蒙元，新朝創建即迭有獻瑞，其意義與價值皆須形諸於制度，尤取決於明太祖的觀點。目前學界對明代瑞應已有闡述，<sup>5</sup>針對明太祖的討論則甚少，有由《明太祖寶訓》的祥瑞紀錄，討論帝王憂患意識者，<sup>6</sup>惟此書在後世重定增修，<sup>7</sup>顯現出不同涵意，應細加分辨考索。本文由明太祖文集蒐集瑞應相關書寫，聚焦於瑞麥、嘉禾、甘露之詔諭詩文，考論其瑞應觀點，輔以近臣之言說著述，以及《明太祖實錄》、《明太祖寶訓》（下文簡稱《實錄》、《寶訓》）等史籍載錄，以見洪武時期瑞應進呈概貌、書寫寓意及影響。

## 二、新朝瑞應與明太祖書寫概貌

明太祖即位前即有瑞應傳說，如元順帝至正 15 年（1355）攻打陳埜先，解鞍假寐之時，有蛇緣臂而走，此蛇有足，類似龍而無角，「人咸以為神龍之徵，未幾，敵眾皆走渡江」。又如至正 18 年（1358）進攻婺城，駐蹕之地有五色雲，氤氳如蓋，城中望之以為祥。<sup>8</sup>蛇似龍而無角，乃神物也，五色雲籠罩，乃上天護佑，如董仲舒

<sup>5</sup> 由史學角度綜論明代瑞應，劉言：《「祥瑞」與明代政治》（長春：東北師範大學明清史學科專業碩士論文，2012）為首發。述及明成祖朝，如李若晴：《玉堂遺音：明初翰苑繪畫的修辭策略》（杭州：中國美術學院出版社，2012），由藝術史角度立論。專論明世宗朝，有結合科舉考試者，如孟兆鑫：《災異祥瑞與殿試策問：嘉靖時期政治生態研究》（西安：西北大學中國史學科專業碩士論文，2019）。

<sup>6</sup> 李峰：〈朱元璋與祥瑞：論封建帝王的憂患意識〉，《瀋陽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16：1（2014.2），頁 125-128。

<sup>7</sup> 《明太祖寶訓》洪武初年由詹同、宋濂等纂編，見明·談遷：《國榷》（臺北：鼎文書局，1978），卷 10，「太祖洪武二十八年」，頁 761。萬曆時重修，故今有兩版本：一為明初詹同等纂：《明太祖寶訓》（《皇明修文備史》明鈔本），一為萬曆時明·陳治本等纂：《明太祖寶訓》（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86）。可參考〔日〕山根幸夫：〈明太祖と寶訓〉，收入東方学会編：《東方學會創立五十周年記念東方學論文集》（東京：東方学会，1997），頁 1157-1170。楊永康：〈洪武七年官修《皇明寶訓》史料價值初探〉，《史學史研究》2008：3（2008.9），頁 86-97。

<sup>8</sup> 明·胡廣等纂：《明太祖實錄》（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66），卷 2，「乙未春正月辛巳」，頁 0024。卷 6，「戊戌十二月甲申」，頁 0073。

（前 176-前 104）謂：「故德侔天地者，皇天右而子之，號稱天子」。<sup>9</sup>這些瑞應均有旁觀者見證、口耳相傳，明太祖沒有質疑態度，此因盱衡天下的政治盤算，必須呈顯自身為天意所鍾、新朝稟承天授的正統性。

除了瑞應傳說，亦有實物獻瑞。如至正 16 年（1356）5 月太平府當塗縣民進瑞麥，至正 17 年 5 月應天府上元縣鍾山鄉民進瑞麥，又有寧國府寧國縣、應天府句容縣進獻。<sup>10</sup>瑞麥出自江浙安徽等地，原應入獻元廷，但因歸附朱元璋，<sup>11</sup>故有獻瑞之舉。惟此類「國之將興」的祥瑞，並非其專利，角逐天下者如張士誠（1321-1367）佔有江南十餘年，輕徭薄賦，民生富庶，必有類似獻瑞行動，只是隨著功業未成而被清除湮滅。<sup>12</sup>

相對的，功成者的獻瑞不絕，明太祖在位三十一年，史籍所載，有瑞應名目、獻瑞情境、太祖令諭、君臣互動等，都為宮廷文化的一環（參見附錄「明太祖時期重要祥瑞一覽表」）。以書寫而言，儒臣頌讚乃獻瑞儀式的常態，明太祖詔諭詩文則有特定寫作背景與考量。考察《大明太祖皇帝御製集》（下文簡稱《御製集》），<sup>13</sup>以植物祥瑞為多，有〈瑞麥諭多方詔〉、〈嘉瓜贊并序〉、〈嘉粟歌并序〉、〈嘉禾詩〉五首、〈嘉禾〉、〈賜和長史黃章瑞瓜韻〉，<sup>14</sup>包括農糧瓜果的瑞應，文體有詔、贊、詩歌

<sup>9</sup> 漢·董仲舒：〈順命〉，《春秋繁露》，收入北京圖書館古籍出版編輯組編：《北京圖書館古籍珍本叢刊》經部第 2 冊（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88），卷 15，頁 588。

<sup>10</sup> 明·胡廣等纂：《明太祖實錄》，卷 4，「丙申五月庚辰朔」，頁 0044。卷 5，「丁酉五月戊寅」、「丁酉五月己卯」，頁 0053。

<sup>11</sup> 明·胡廣等纂：《明太祖實錄》，卷 4，「丙申春三月辛卯」，頁 0043：「置上元、江寧二縣」。

<sup>12</sup> 張士誠之瑞應甚少流傳，然清初猶有鬼神傳說，如清·袁枚：〈瓦屑廟石人無頭〉，《袁枚全集·子不語》（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3），卷 23，頁 449：「相傳張士誠被圍，夜有石將軍率部伍拒戰甚勇，城破後，廟中石人頭俱墜地矣。」

<sup>13</sup> 明·朱元璋：《大明太祖皇帝御製集》（臺北：故宮博物院藏明內府朱絲欄鈔本），共 21 卷，首卷為目錄，存 18 卷，卷 14、15、19 佚失。按：北京國家圖書館藏有明鈔本《大明太祖皇帝御製集》，僅存第 15 卷，可資補益。北京中華書局 2015 年將此書「二十一卷，存十八卷」影入《稀見明史研究資料五種》出版。關於此本由來，包遵彭：〈明太祖及其文章——為明太祖御製文集影印出版作〉，收入明·朱元璋：《明太祖御製文集》（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65），頁 6，謂萬曆 2 年張居正所輯。郭嘉輝：〈略論《大明太祖皇帝御製集》及其史料價值〉，《中國文化研究所學報》61（2015.7），頁 177，謂此本可能與嘉靖朝重編有關。本文不涉入版本考辨，惟在引用論述時，參酌史籍及近臣著述，考索寫作背景與內容，避免誤收之情形。

<sup>14</sup> 明·朱元璋：〈瑞麥諭多方詔〉，《大明太祖皇帝御製集》，卷 1，頁 4 下-5 上；〈嘉粟歌并序〉，卷 17，

等，並有序文記述獻瑞過程，下文將會討論。

摹寫動物之瑞者，有〈題獲麟〉：「孔子西虞鉅野郊，獵人至獲獻烹庖。智哉閱獸非常獸，知是周衰絕貢茆」（卷 21，頁 26 下），此詩感歎周朝衰微史事，並非真有麒麟之瑞。又有〈蒐獸〉：「飛廉跋扈驅除盡，等待麒麟出苑中」（卷 20，頁 35 上），表達期待祥瑞，暗寓掃除群雄、盛世將臨之意。事實上，洪武時期動物之瑞甚少，惟明太祖仍有二則口諭：一為洪武 5 年（1372）11 月河南民獻白兔，命放回山野。<sup>15</sup>一為洪武 28 年（1395）7 月汝寧府確山縣出現野蠶成繭，群臣表賀，其曰：「人君以天下為家，使野蠶成繭足以衣被天下之人，朕當受賀，一邑之內，偶然有之，何用賀為」，<sup>16</sup>視野蠶成繭為偶然之事，觀點務實理性，傳達「衣被天下之人」的愛民觀點，未見自矜自喜的意態。

書寫特殊自然景象者，有〈甘露論〉及五律〈甘露〉，後者僅存其目。<sup>17</sup>至如〈喜雨賦〉、〈時雪〉之類書寫，<sup>18</sup>乃誌記祈禱應驗，喜得甘霖、瑞雪之事。洪武朝最常出現的奇異天象為五色雲，據《天元玉曆祥異賦》謂：「天子氣或有五色，多晨昏見」，<sup>19</sup>惟相關載錄甚簡，多註明「五色雲見」，<sup>20</sup>明太祖亦未書寫，但有二則口諭：一為洪武 18 年（1385）4 月癸巳五色雲見，乙未五色雲又見，禮部請率百官表賀，明太祖曰：「天下康寧，人無災害，祥瑞之應，固和氣所召，昔舜有卿雲之歌，當時有元凱

頁 13 下-14 下；〈嘉禾詩〉五首，卷 20，頁 17 下-18 下；〈嘉禾〉，卷 20，頁 26 上；〈賜和長史黃章瑞瓜韻〉，卷 20，頁 39 下。〈嘉瓜贊有序〉見明·朱元璋：《高皇帝御製文集》（臺北：國家圖書館藏明嘉靖 14 年徐九臯江都刊本，以下簡稱「嘉靖本」），卷 16，頁 5 上-6 下。

<sup>15</sup> 明·胡廣等纂：《明太祖實錄》，卷 75，「洪武五年十一月丙戌」，頁 1391。

<sup>16</sup> 明·胡廣等纂：《明太祖實錄》，卷 239，「洪武二十八年七月戊戌」，頁 3480。亦見明·陳治本等纂：〈謙德〉，《明太祖寶訓》，卷 1，頁 56。

<sup>17</sup> 明·朱元璋：《大明太祖皇帝御製集》卷 14 有〈甘露論〉，卷 19 有五律〈甘露〉，但二卷已佚。〈甘露論〉見於明·朱元璋：《高皇帝御製文集》（嘉靖本），卷 7，頁 15 上-16 下。

<sup>18</sup> 明·朱元璋：〈喜雨賦〉，《高皇帝御製文集》（嘉靖本），卷 17，頁 24 上；〈時雪〉，卷 18，頁 25 上-25 下。

<sup>19</sup> 明·朱高熾：〈望氣部·帝王氣象第一〉，《天元玉曆祥異賦》（臺北：大塊文化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20），頁 860。

<sup>20</sup> 如明·胡廣等纂：《明太祖實錄》，卷 74，「洪武五年六月辛巳」，頁 1359；卷 83，「洪武六年六月丁丑」，頁 1482。

岳牧之賢，相與共致雍熙之治。朕德不逮，治化未臻，豈可遽以是受賀。前代帝王喜言祥瑞，臣下從而和之，往往不知省懼，以至災異之來，不復能弭，蓋誇侈之心生，則戒慎之志怠，故鮮克有終，可以為戒。」<sup>21</sup>—為洪武 21 年（1388）5 月乙酉五色雲見，學士劉三吾（1313-1400）進曰：「雲物之祥，徵乎治世，舜之時形于詩歌，宋之時以為賢人之符，此實聖德所致，國家之美慶也。」明太祖曰：「古人有言，天降災祥在德，誠使吾德靡悔，災亦可弭，苟爽其德，雖祥無福。要之，國家之慶，不專於此也。」<sup>22</sup>二則記錄猶如公式，太祖口諭亦如套語，表達自我謙懷，並曉諭臣下必須戒慎。

明太祖深信天象，且有觀測之能，曾謂：「朕自起兵以來，與善推步者仰觀天象，二十有三年矣」，<sup>23</sup>「善推步者」即劉基（1311-1375），《御製集》中〈與劉伯溫書〉謂：「從朕於群雄未定之秋，居則每匡治道，動則仰觀乾象，察列宿之經緯，驗日月之何光，發縱指示，三軍往無不克」（卷 7，頁 8 下）。惟天象有災、祥之分，其重視的是災異警示，如吳元年（1367）10 月丙午謂侍臣曰：「吾自起兵以來，凡有所為，意向始萌，天必垂象示之，其兆先見，故常加儆省，不敢逸豫。」<sup>24</sup>即使國已創建，「夜臥不能安席，披衣而起，或仰觀天象，見一星失次，即為憂惕，或量度民事，有當速行者，即次第筆記，待旦發遣。朕非不欲暫安，但祇畏天命，不得不爾。」<sup>25</sup>洪武 9 年（1376）9 月有不祥天象，特撰〈求言詔〉自省，允許臣民進言：「邇來欽天監報：五星紊度，日月相刑。於是靜居自省，皆古今乾道變化，殃咎在乎人君。尋思至此，惶惶無措手足，惟詔告臣民，許言朕過」（卷 1，頁 12 下-13 上）。明太祖視五色雲為「國家之慶，不專於此也」，可見理性態度，問題是甘露亦屬天象吉兆，為何特有撰述？表達什麼觀點？值得探究。以下分別考索明太祖瑞麥、嘉禾、甘露

<sup>21</sup> 明·胡廣等纂：《明太祖實錄》，卷 172，「洪武十八年夏四月癸巳」、「洪武十八年夏四月乙未」，頁 2631。亦見明·陳治本等纂：〈謙德〉，《明太祖寶訓》，卷 1，頁 55。

<sup>22</sup> 明·胡廣等纂：《明太祖實錄》，卷 190，「洪武二十一年五月乙酉」，頁 2872。亦見明·陳治本等纂：〈謙德〉，《明太祖寶訓》，卷 1，頁 56。

<sup>23</sup> 明·胡廣等纂：《明太祖實錄》，卷 111，「洪武十年春三月丁未」，頁 1850。

<sup>24</sup> 明·陳治本等纂：〈警戒〉，《明太祖寶訓》，卷 4，頁 270。

<sup>25</sup> 明·胡廣等纂：《明太祖實錄》，卷 115，「洪武十年九月戊寅」，頁 1882。

的詔諭詩文。

### 三、瑞麥詔諭與祥瑞認證制度

瑞麥乃一莖多歧的小麥，史籍中的進獻紀錄，包括前述至正年間當塗、上元、寧國等地，又有吳元年（1367）4月句容之獻，洪武2年（1369）4月癸巳淮安、寧國、鎮江等地之獻等，明太祖有口諭及詔令，牽動著新朝瑞應制度的建立。

#### （一）洪武朝的瑞麥之獻與口諭

吳元年4月句容之獻入錄《明太祖寶訓》，用以垂示子孫，但有兩種版本：一為洪武7年（1374）詹同等纂修之鈔本，置於〈祥異〉章：

句容縣民以兩岐之麥來獻，中書以聞。帝取而觀之曰：自吾至江左，麥秀如此者，凡幾見矣。因問起居注詹同等曰：草木之瑞有此乎？同對曰：昔在成周，嘉禾同穎。漢張堪守漁陽，麥秀兩岐。帝曰：此亦偶然，何以謂之瑞乎？<sup>26</sup>

明太祖的發問，意在學習、借鏡前代的瑞應紀錄，故詹同引經據典追溯文化傳統，「昔在成周，嘉禾同穎」，典出《尚書》，<sup>27</sup>「漢張堪守漁陽，麥秀兩岐」出自《東觀漢記》，<sup>28</sup>故瑞麥乃治世象徵，新朝之瑞麥足與周、漢同美。但朱元璋未予輕信，仍以為出於偶然。儒臣遵從其意，錄之於〈祥異〉章，所謂「祥異」乃瑞麥之奇異稀罕，並未強調明太祖之美德或作為。

另為萬曆30年（1602）由陳治本（萬曆20年1592進士）等校閱重修之本，置於〈勤民〉章：

<sup>26</sup> 明·詹同等纂：〈祥異〉，《明太祖寶訓》，收入《皇明修文備史》第1冊（北京：國家圖書館藏明鈔本），卷3，不著頁次。

<sup>27</sup> 「唐叔得禾，異畝同穎。」屈萬里集釋：〈書序集釋〉，《尚書集釋》（臺北：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1983），頁300。

<sup>28</sup> 漢·劉珍等纂：〈張湛〉，《東觀漢記》，收入《文淵閣四庫全書》史部第370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卷15，頁159。

吳元年四月，是月應天府句容縣耆民施仁等獻瑞麥，太祖下令諭民曰：「自渡江以來十有三載，境內多以瑞麥來獻。丙申歲，太平府當塗縣麥生一幹兩歧。丁酉歲，應天府上元縣麥生一莖三穗，寧國府寧國縣麥生一莖二穗，今句容縣又獻麥一莖二穗，蓋由人民勤於農事，感天之和，以致如斯。爾民尚盡力畝畝，以奉父母、育妻子，永為太平之民，共享豐年之樂。」起居注詹同進曰：「昔在成周，嘉禾同穎。漢張堪守漁陽，麥秀兩歧。今主上撥亂世而反之正，功德大矣。雖戎馬之際，亦修農務，故斯民得脫喪亂，盡力田畝，天降瑞麥，非偶然也。」太祖曰：「天不可必人事，則當盡為國家者，豈可恃此而自怠乎！」<sup>29</sup>

文中著錄的獻瑞時間、人物與令諭，出於胡廣（1369-1418）等纂《明太祖實錄》，<sup>30</sup>乃明成祖朱棣（1360-1424）時期的增補。明太祖下令諭民，曉示「盡力畝畝」、「奉父母、育妻子」、「永為太平之民」三端，前二者屬於行動的安順，後者為心理的臣服，以君父之姿教化百姓，感知天心，守分忠誠，社會秩序端整，則可共享豐年。特別是獻瑞地點為「句容」，乃明太祖之祖鄉，<sup>31</sup>可連結出祖宗的庇蔭，與他處所獻大有不同，如洪武5年6月句容獻同蒂之瓜，明太祖特別親撰〈嘉瓜贊〉，<sup>32</sup>亦是此理。

細究萬曆本《寶訓》著錄口諭，情理兼具，又由〈祥異〉章改置於〈勤民〉章，意在標舉明太祖勤政愛民，特別是「天不可必人事，則當盡為國家」，體察上天不可確保所有人事，唯有盡心為國，不可自怠，表達出對於瑞應的積極觀點。篇章與敘述的更動，讓人聯想萬曆時期明神宗朱翊鈞（1563-1620）親政後荒怠朝政、遠離臣民，儒臣藉由重修《寶訓》，將瑞麥與〈勤民〉連結，彰顯君主當勤於國事，實乃敬天法祖之意。由此可推見明太祖的瑞應觀被用作典範，約束君權天授的帝王權勢，

<sup>29</sup> 明·陳治本等纂：〈勤民〉，《明太祖寶訓》，卷3，頁221-222。按，「漢」為誤字，應為「漢」。

<sup>30</sup> 明·胡廣等纂：《明太祖實錄》，卷23，「吳元年夏四月」，頁0336-0337。明·鄭曉著，李致忠點校：《今言》（北京：中華書局，1984），卷1，頁7謂：「《明太祖實錄》建文君即位時初修，靖難後再修，解縉得罪後三修。」

<sup>31</sup> 「世居沛國相縣，其後有徙居句容者，世為大族，人號其里為朱家巷。」明·胡廣等纂：《明太祖實錄》，卷1，頁0001。

<sup>32</sup> 明·朱元璋：〈嘉瓜贊有序〉，《高皇帝御製文集》（嘉靖本），卷16，頁5上-6下。

勸諫明神宗的恣意妄為。

洪武本《寶訓》僅著錄吳元年句容縣獻麥一則，傳達明太祖不輕信祥瑞的態度，其後未再著錄獻瑞之事。萬曆本《寶訓》則不然，又著錄洪武2年（1369）4月癸巳淮安、寧國、鎮江等地獻瑞麥二十本，群臣皆賀，明太祖曰：

朕為民主，惟思修德致和，以契天地之心，使三光平、寒暑時、五穀熟、人民育，為國家之瑞。蓋國家之瑞不以物為瑞也，昔堯舜之世不見祥瑞，曾何損於聖德，漢武帝獲一角獸、產九莖芝，當時皆以為瑞，乃不能謙抑自損，撫輯民庶，以安區宇，好功生事，卒使國內空虛、民力困竭，後雖追悔，已無及矣。其後神爵甘露之侈，致山崩地震，而漢德于是乎衰。由是觀之，嘉祥無徵而災異有驗，可不戒哉！<sup>33</sup>

此論亦錄自《實錄》，<sup>34</sup>萬曆儒臣置之於〈謙德〉章，強調君主謙抑自損，修德致和，則可契合天地之心。此乃由君主品德的角度，再次期請明神宗敬畏天地、取效先祖。細察所謂「謙德」，旨在強調君德可以符應天意，此與悠遠的瑞應文化傳統有關，陳磐研究古代讖緯，指出「原夫符應思想，本與五帝德說互為因果，有德者必有符，有其符，是以知其德」，<sup>35</sup>巫鴻研究漢代武梁祠壁畫，指出麟、馬、木連理等祥瑞「是對一國之君作出一系列指令：當權者必須成為儒家德行的榜樣；他必須禮賢下士；在他的宮廷中不能有溜須拍馬者的立足之地；他的統治必須公正；他的國家必須太平而強大。最後，在沒能達到上述準則的時候，他必須有能力自我批評。」<sup>36</sup>故君德與瑞應連結，別具禮賢下士、統治得法之意，明太祖口諭猶如「自我批評」，以漢武帝恃祥而驕為戒。他的瑞應觀點不僅符合儒家推崇的君德，甚且超越了漢武帝，故儒臣置於〈謙德〉章加以塑造、顯揚，希冀明神宗有所取法。

## （二）瑞麥詔令與政治現實

<sup>33</sup> 明·陳治本等纂：〈謙德〉，《明太祖寶訓》，卷1，頁49-50。按：時間誤作「洪武四年二月癸巳」。

<sup>34</sup> 明·胡廣等纂：《明太祖實錄》，卷41，「洪武二年四月癸巳」，頁0825、0826。

<sup>35</sup> 陳磐：〈序言〉，《古讖緯研討及其書錄解題》上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頁1。

<sup>36</sup> 〔美〕巫鴻著，李清泉等譯：《中國古代藝術與建築中的「紀念碑性」》（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頁372。

《寶訓》、《實錄》載錄之外，明太祖針對洪武2年（1369）4月迭獻瑞麥，特撰〈瑞麥諭多方詔〉，值得注意：

朕聞古君有大德，天下人民普安，共樂豐年，恩不私惠，法不濫刑，此大聖人之道也。曩因胡君失政，天下兵起，豪傑分爭，海內鼎沸，大為民殃，雖至賢者不能自存。朕本淮右布衣，率眾渡江，練兵養民，十有四年，疆宇日廣，臣民擁戴，為天下主。即位以來，元年至二年，早徧中原江左等處，日夜思慮，心寔未寧，豈德薄不才，天降其殃乎？乃者，中書禮部節次奏聞台州、鎮江、揚州，民產瑞麥，皆捧入殿庭，臣民將以為朕之德歟？乃天降祥而致然歟？朕以為不然。朕若有德，必風雨以時，天下共豐，何獨祥一二民家？其不為朕之所感，明矣。如天降祥於一二民家，理誠有之，其故何也？蓋此農民心存至道，勤於田畝，故感上蒼，降茲祥瑞，實民之德，朕何與焉？是用諭告多方，悉知此意，使天下之人皆能效此良民，勤於農務，存心道禮，協助朕之治化，以致祥徧區宇，共享太平之福，朕何幸哉。（卷1，頁4下-5上）

此詔下署「洪武二年五月」，乃因應4月癸巳獻麥而作。篇題「諭多方」，藉瑞麥行訓民教化，此為明太祖治國特色，如王禕（1322-1374）曾謂：「三代下人主，知政不知教。自古帝王，身兼君師，陛下訓民，天下師也」。<sup>37</sup>其重點有六：一為標榜君德，視為大聖人之道。一為起兵之由，乃元君失政，殃及庶民。一為稱帝之因，乃練兵養民，被擁為帝。一為建國之後，中原江左苦旱，但各地迭獻瑞麥。一為表達謙懷，乃良民之德，不歸功自我。一為諭告百姓，效此良民，以共享太平。

就文體而言，「詔」是君王向臣民宣告重大事件的文書，有隆重的開讀儀式。<sup>38</sup>考察《御製集》所錄詔令，有開國、定都、立儲等內容，<sup>39</sup>又有口語與文言之別。<sup>40</sup>

<sup>37</sup> 明·談遷：《國權》，卷4，「太祖洪武三年」，頁418。

<sup>38</sup> 明·申時行等纂：〈開讀〉，《明會典》，收入《文淵閣四庫全書》史部第617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卷73，頁707-710。

<sup>39</sup> 如《御製集》收錄〈即位詔〉、〈立南北京詔〉、〈立皇太孫詔〉等。亦有他人代筆者，如〈科舉詔〉、〈封安南國王詔〉等乃王禕代筆，見明·王禕：《王忠文集》，收入《文淵閣四庫全書》集部第1226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卷1，頁247-249。

<sup>40</sup> 明太祖詔令有親撰、口授、修潤、代筆之不同，可參考萬明：〈明代詔令文書研究——以洪武朝為中心的初步考察〉，《明史研究論叢》8（2010.7），頁1-35。連文萍：〈題畫與政治——明太祖題畫詩文

此詔屬於文言體，文字頗精煉，可能經儒臣潤色。此為帝王書寫的特色，然如趙翼（1727-1814）所謂：「明祖以遊丐起事，目不知書，然其後文學明達，博通今古，所傳御製集，雖不無詞臣潤色，然英偉之氣自不可掩」，<sup>41</sup>明太祖的情志與思想貫注於詔諭詩文，無論是親撰或經過潤色，其撰述背景、情境、內容寓意等，皆應深入考索。

此篇詔令的頒行，顯然把瑞麥之獻視為國家大事，但對照明太祖對句容瑞麥的不輕信態度，其用意值得考察。要注意的是詔中所言「元年至二年，旱徧中原江左等處」，可見新朝初建即發生大面積的旱災，禾苗枯槁、民生艱困可以想見，最要緊是民心問題，如錢穆論述元末明初儒士，謂：「彼輩之於明祖，其先亦何嘗不以群盜視之」，又謂「元明之際，江浙社會經濟豐盈，詩文鼎盛，元廷雖不用士，而士生活之寬裕優游，從容優雅，上不在天，下不在地，而有山林江湖可安，歌詠觴宴可逃，彼輩心理上之不願驟見有動亂，亦宜然矣。」<sup>42</sup>明太祖被視為「群盜」之一，新朝創建又未帶來安定平靜，反是災異不斷，民心如何穩固？

此外，獻瑞與地方官員的推動有關，如卜正明謂：「洪武皇帝知道他統治的是一個『多絕戶荒田』的國家。他任命的第一批知縣走馬上任，迎接他們的是荒蕪的土地、匱乏的資源與凋敝的生產」，<sup>43</sup>所謂「第一批知縣」，與朝中儒臣一樣苦於災異及百廢待舉，必須有所作為，進呈瑞麥能表出政績，又能讚美君德、輸忠避禍，但如此一來瑞麥又何瑞之有？

因為瑞麥與荒蕪凋敝的民生現實相違，故詔中明太祖強調「日夜思慮，心寔未寧」，又嘆「德薄不才」，謹慎的分辨上天降災，瑞麥只生於少數民家，乃「農民心存至道，勤於田畝」所致，此非國家之瑞。以此，詔令雖是訓諭人民，但其姿態頗低，重點在安頓內政與民心，期待協助治化、國祚永保。

---

的考察》，《臺大中文學報》82（2023.9），頁115-116。

<sup>41</sup> 清·趙翼：〈明祖文義〉，《二十二史劄記》（臺北：世界書局，1968），卷32，頁464。

<sup>42</sup> 錢穆：〈讀明初開國諸臣詩文集〉，《中國學術史思想論叢（六）》（臺北：東大圖書股份有限公司，1985），頁125。

<sup>43</sup> 〔加〕卜正明著，方駿等譯：〈冬〉，《縱樂的困惑——明代的商業與文化》（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4），頁3。

將此詔對照前述《實錄》、《寶訓》所載洪武2年4月各地獻瑞，會發現有趣的現象。《實錄》、《寶訓》未見中原江左苦旱的陳述，亦無明太祖「日夜思慮」、「德薄不才」，反而是修德致和、謙謙胸懷，又能援引典故，由堯舜和漢武正反立論，表達「嘉祥無徵而災異有驗」的觀點。因此，新朝初創顯得平靜而富庶，明太祖為飽學謙遜又自信的英主，這正是後世儒臣對君王的美好期待，是他們詮釋出來的新朝新君理想典型。

〈瑞麥諭多方詔〉頒行後，洪武3年（1370）5月又有陝西寶雞獻瑞麥，但政局世情並未改觀，劉基〈瑞麥頌〉可見實況。此頌前有序文，首言「天厭元德，九州糜沸」，明太祖奮起於草萊，豪傑景附，生民有歸，神祇有託，故祥瑞並奏，然「帝心謙抑，每讓弗居」，因此細說獻瑞背景及意義：

洪武三年五月，陝西寶雞縣進瑞麥：一莖五穗者一本，三穗者三本，兩穗者十有餘本。蓋自兵興以來，王保保據周、宋，李思齊、張思道據秦、晉、燕、趙、齊、梁之間，大豪小猾，或憑城郭，或聚山寨，皆假元為名，分割境土，擅兵相攻。於是燕、晉、周、秦之地，彌數千里，連歲無雨，百穀不生，民相殺、食且盡。今年夏四月，王師奏捷于蘭州，朔漠掃清，關隴底定，天乃大降甘雨，滋為嘉瑞，和氣致祥，不亦昭哉！《周頌》有曰：「綏萬邦，屢豐年，天命匪懈」，傳者謂商之季年，比歲早荒，至周武王克紂受命，而天下遂獲豐年。由今觀之，信非誣矣。漢謠以麥穗兩岐，歌其太守之美政，則是兩岐之麥，世所希有，而況於三岐以至五岐者哉！頌聲之作，弗可闕也。<sup>44</sup>

劉基行文井然，引經據典，頌美瑞麥之獻。惟其無法迴避寶雞的饑荒，故主張乃天厭元德、兵革苦旱，瑞麥則是王師底定朔漠關隴，上天賜予甘雨所致。由此文可知，洪武元年、2年中原江左苦旱，北方陝西亦是戰亂饑饉，<sup>45</sup>且到洪武3年仍未緩解。此文妙處在於聯結商朝末年的乾旱，指出周武王（前1076-前1043）代之而起，天下遂獲豐年，故寶雞瑞麥如同正義王師的豐績，足以比肩西周，超越漢代，詮解了

<sup>44</sup> 明·劉基：〈瑞麥頌并序〉，《誠意伯文集》，收入《文淵閣四庫全書》集部第1225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卷20，頁475。

<sup>45</sup> 「洪武2年正月庚戌山東旱災，洪武2年12月甲申陝西旱災。」周致元：〈洪武時期的農業自然災害和救災措施〉，《中國農史》19：2（2000.5），頁18。

眼前的艱困政局。

明太祖之詔與劉基之頌，一在宣告，一在頌讚，對於洪武 2 年、3 年瑞麥之獻，表述別有異同，實與各自立場有關。相同處在於新朝面臨苦旱饑饉，君臣皆須發聲，表出天命，解除危機。不同之處在於，明太祖為君，可獨立思辨，又須表出謙德，故直言「實民之德，朕何與焉？」劉基為臣，「頌聲之作」乃朝廷獻瑞儀式的一環，必須善盡義務，頌瑞輸忠。

洪武 3 年的寶雞瑞麥，亦成為後世取效的典範。《實錄》記錄明太祖的口諭，《寶訓》援引入錄〈謙德〉章：

向者鳳翔饑饉，朕閔其民，故特遣人賑恤。曾未數月，遽以瑞麥來獻。借使鳳翔人未粒食，雖有瑞麥何益？苟其民皆得所養，雖無瑞麥何傷？朕嘗觀自古以來天下無金革鬪爭之事，時和歲豐，家給人足，父慈子孝，夫義妻順，兄愛弟敬，風俗淳美，此足為瑞世，若此麥之異，特一物之瑞，非天下之瑞也。<sup>46</sup>

明太祖展現明智判斷，強調「特一物之瑞，非天下之瑞」，呈顯出君主看待瑞應的謙懷與高度。又有嘉靖時期的王得春（1527-1568）所上〈據明詔罄愚衷疏〉，對明世宗朱厚熜（1507-1567）提出諫言，其中「禁諂諛」謂：

恭惟我朝開國，卓越千古，故大聖人之所作為，亦迥出常情萬萬也，姑舉一二事言之。洪武二年，陝西寶雞縣進瑞麥一莖而二穗、三穗、五穗者甚眾。太祖曰：「朕為生民主，惟思脩德致和，以契天地之心，使三光平、寒暑時、五穀熟、人民育，為國家之瑞，蓋不以物為瑞也」。<sup>47</sup>

所謂「迥出常情萬萬」，「常情」是君主多喜祥瑞而被蒙蔽，「迥出」為不恃禎祥、明辨諂諛，故表彰明太祖對寶雞瑞麥的諭示，實乃籲請明世宗取法祖上、明察聖聽。此疏日後被陳子龍（1608-1647）選入《明經世文編》，視為經世濟民之道，可見明太

<sup>46</sup> 明·胡廣等纂：《明太祖實錄》，卷 52，「洪武三年五月丁巳」，頁 1031。又見明·陳治本等纂：〈謙德〉，《明太祖寶訓》，卷 1，頁 51-52。

<sup>47</sup> 明·王得春：〈據明詔罄愚衷疏〉，明·陳子龍：《明經世文編》，收入《四庫禁燬書叢刊》集部第 27 冊（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卷 367，頁 563-564。

祖瑞麥詔諭被後世儒臣表彰，祈請君主取法，其解讀並非固定不變，豐年、勤民、謙德、禁諂諛，皆應時所需而推陳出新。

### （三）祥瑞認證與進呈制度

明太祖以〈瑞麥諭多方詔〉向臣民宣告，有謂「天降祥於一二民家，理誠有之」，可見亦有民家之祥瑞。考察明代常見的民家祥瑞，除農家瑞麥，又有孝子廬墓出現白兔、白猿、慈烏，<sup>48</sup>或積善能文之家出現靈芝等。<sup>49</sup>也有上臻地方之瑞者，如前引江浙等地迭生瑞麥，再如慈谿知縣崔嵩（弘治 9 年 1496 進士）「有惠政，未踰年而瑞麥、瑞穀兩見於夏秋，人以為德政所感」，黃巖知縣周旭鑑「鋤強植弱，振興士類，表倡風俗，致瑞麥駢桑之應」，<sup>50</sup>皆用以表出宦蹟。相對的，亦有發現祥瑞而弗奏，如魏驥（1375-1472）「蒞官所至，崇正抑邪，務大體，山川壇獲雙白兔，圻內生瑞麥，皆卻弗奏」，<sup>51</sup>代表為官正派廉能，此乃不諂諛之意。是知祥瑞的認定與進獻不一，最要緊的是國家之瑞，應有明確的認證與進呈制度，此係禮部權責，故洪武 2 年（1369）5 月〈瑞麥諭多方詔〉之後，禮部尚書崔亮（?-1370）等人於 9 月上奏曰：

凡祥瑞應見皆為國家休徵。按《唐六典》，四瑞有大瑞、上瑞、中瑞、小瑞。其大瑞，景星、慶雲、麟、鳳、龜、龍之類。上瑞，白狼、赤兔之類。中瑞，蒼烏、朱鴈之類。小瑞，嘉禾、芝草、連理枝之類。又按《唐令》，凡祥瑞應若麟、鳳、龜、龍之類，依圖書合大瑞者，所司隨即表奏，百僚詣闕，上表奏賀，告廟頒下。其餘諸瑞，並令所司轉申以聞。若鳥獸之類，有生獲以獻者，仍遂其本性，放之山野。亦有不可致者，如連理枝之類，則不須齋送。今擬凡祥瑞應見若麟、鳳、龜、龍之類合大瑞者，許各處表奏，不得泛言虛

<sup>48</sup> 如清·羅石麟等纂：〈孝義〉，《山西通志》，收入《文淵閣四庫全書》史部第 547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卷 141，頁 14；「明初郭璿廬墓稱孝，出現白兔之祥」；〈孝義〉，卷 146，頁 62，馬宗盛有「白猿、慈烏集塚之異」。

<sup>49</sup> 明·劉崧：〈蕭氏芝草記〉，《槎翁全集》，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第 24 冊（臺南：莊嚴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96），卷 5，頁 446。

<sup>50</sup> 明·過庭訓：〈崔嵩〉，《本朝分省人物考》，收入《四庫禁燬書叢刊》史部第 60 冊（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卷 5，頁 300；〈周旭鑑〉，收入《四庫禁燬書叢刊》史部第 62 冊，卷 60，頁 171。

<sup>51</sup> 明·過庭訓：〈魏驥〉，《本朝分省人物考》，收入《四庫禁燬書叢刊》史部第 61 冊，卷 49，頁 537-538。

飾，干惑上聽，其餘諸瑞，所在官司驗實圖進。<sup>52</sup>

可見明代官方界定瑞應乃承襲《唐六典》，具有興復文化傳統之意。瑞應分為大瑞、上瑞、中瑞、小瑞四等，有相應處理模式。「大瑞」至為重要，須立即表奏朝廷，以便百官奏賀、祭祀告廟及頒示天下，但因麒麟、鳳凰、神龜、神龍等難於一見，多有辨識問題，故有按驗程序，強調「不得泛言虛飾，以惑上聽」。所謂「依圖書合大瑞者」，即依照瑞應圖書以按驗真偽，如王充《論衡》謂：「如有大鳥，文章五色；獸狀如驢，首戴一角，考以圖象，驗之古今，則鳳、麟可得審也。」<sup>53</sup>惟未言「圖象」為何，崔亮章奏亦未具載書名。

考察明代儒臣頌贊瑞應詩文，多引《瑞應圖》為據。<sup>54</sup>如洪武初年，劉基〈甘露頌〉謂：「臣聞《瑞應圖》曰：王者德至于天，則甘露降。」<sup>55</sup>永樂 11 年（1413）騶虞之獻，楊榮（1371-1440）〈瑞應騶虞詩〉謂：「臣榮僅按《瑞應圖》云：騶虞，義獸也。」<sup>56</sup>嘉靖 22 年（1543）嚴嵩（1480-1567）〈禾麥重祥頌〉謂：「《瑞應圖》曰：嘉禾，五穀之長，王者德茂則生。」<sup>57</sup>可見《瑞應圖》在明代宮廷甚為權威，但諸臣援引釋義，未及於圖像，且未註出作者。

崔亮的奏疏，對其餘諸瑞也有規定。如為生獲之鳥獸，將放回山野；如為連理枝之類的植物，則由所司驗實，繪圖以進，此亦《唐六典》所謂：「所在案驗非虛，

<sup>52</sup> 明·胡廣等纂：《明太祖實錄》，卷 45，「洪武二年九月癸卯」，頁 0880。按：《唐令》即唐·李林甫等纂，陳仲夫點校：〈尚書禮部〉，《唐六典》（北京：中華書局，1992），卷 4，頁 114-115：「凡祥瑞應見，皆辨其物名。……」又見明·俞汝楫：〈祥異備考·有司表奏災祥〉，《禮部志稿》，收入《文淵閣四庫全書》史部第 597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卷 88，頁 576-577，按：此本「赤兔」作「白兔」。

<sup>53</sup> 漢·王充：〈講瑞篇〉，《論衡》，卷 16，頁 199。

<sup>54</sup> 李若晴：〈瑞應圖書與繪畫考略〉，《中國國家博物館館刊》2016：9（2016.9），頁 84-99，認為《瑞應圖》為梁人孫柔之所著，原本有圖有文，到明、清之時圖譜已佚。

<sup>55</sup> 明·劉基：〈甘露頌并序〉，《誠意伯文集》，卷 20，頁 478。

<sup>56</sup> 明·楊榮：〈瑞應騶虞詩有序〉，《文敏集》，收入《文淵閣四庫全書》集部第 1240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卷 1，頁 5。

<sup>57</sup> 明·嚴嵩：〈禾麥重祥頌有序〉，《鈐山堂集》，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第 56 冊（臺南：莊嚴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96），卷 18，頁 167。按：文中未言獻瑞時間，事見明·徐階等纂：《明世宗實錄》（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66），卷 277，「嘉靖二十二年八月丙子」，頁 5413-5414。

具圖畫上」。<sup>58</sup>前述洪武 5 年（1372）11 月丙戌「河南民獻白兔，命放之野」，即是將生獲之鳥獸，依其本性放回山野。至於植物「繪圖以進」，仍有各別作法，如瑞麥就可繪圖、實物並呈。惟洪武時期的圖繪已難於一見，以明太祖務實的祥瑞觀點推測，當日祥瑞圖繪乃公文的一部分，不強調藝術性，重在實用與寫真，以利官員按驗虛實。

#### （四）祥瑞思辨與災異消弭

崔亮的奏疏明定瑞應入獻、按驗、奏賀、告廟、頒示天下，皆與宮廷典儀、書寫等連動，有實物或圖繪作為依據，成為明代宮廷政治文化的重要內容。明太祖接受此奏，但另有指令：

卿等所議，但及祥瑞，而不及災異。不知災異之來，乃上天垂誠，所係尤重。今後四方或有災異，無論大小，皆令有司即時飛奏。<sup>59</sup>

此諭不言瑞應，反而要求凡有災異即時上報，可知其不以祥瑞自喜，乃出於對天意的體察，上天垂示為一體兩面，災異尤為緊要。

相較於將瑞麥歸功於農家，明太祖將災異歸疚於自己，並有消弭災異的作為。萬曆本《寶訓》在〈謙德〉、〈勤民〉之外，特立〈弭災異〉一章，記錄吳元年（1367）6 月戊辰天旱，明太祖歸因於自我「不德」，故減膳素食，宮中皆然，不久即降下「甘雨」。又有洪武元年（1368）8 月壬申，近京師火災、水旱災相仍，其修德省愆，要求中書省臣輔佐修省，以消天譴，並謂「君臣一體，苟知警懼，天心可回」。<sup>60</sup>

回顧洪武 3 年（1370）的瑞麥與苦旱，5 月丁巳寶雞縣進獻瑞麥，但旱災並未止息，6 月戊午朔，明太祖親自禱雨，此事具載萬曆本《寶訓》的〈勤民〉章：

朕已擇明日詣山川壇躬為禱之，爾中書各官其代告諸祠。且命皇后與諸妃親執爨，為昔日農家之食，令太子諸王供饋于齋所。至是日四鼓，太祖素服草

<sup>58</sup> 唐·李林甫等纂，陳仲夫點校：〈尚書禮部〉，《唐六典》，卷 4，頁 115。

<sup>59</sup> 明·胡廣等纂：《明太祖實錄》，卷 45，「洪武二年九月癸卯」，頁 0880。又見明·俞汝楫：〈祥異備考·有司表奏灾祥〉，《禮部志稿》，卷 88，頁 577。

<sup>60</sup> 明·陳治本等纂：〈弭災異〉，《明太祖寶訓》，卷 4，頁 289-291。

履，徒步出詣山川壇，設藁席露坐。晝曝于日，頃刻不移，夜臥于地，衣不解帶。皇太子捧榼進蔬食雜麻麥菽粟，凡三日。既而大雨，四郊霑足。<sup>61</sup>

明太祖以農為立國之本，其平日「每與宮人語，不離稼穡組紉，後宮屏障坦壁，多繪耕織相」，<sup>62</sup>旱災損及農耕，則親自禱雨，並要求后妃諸子及臣下合力弭災。此則著錄可見明太祖以為瑞麥乃出於偶然，對災異則有積極作為，以君臣一體的概念，親自禱雨，又動員所有宮廷成員參與，貫徹敬天畏天的意志。

#### 四、嘉禾詩頌與邊境經營

瑞麥是洪武朝重要瑞應，又有嘉禾與之並稱，如前引嚴嵩〈禾麥重祥頌〉即謂：「昔我太祖高皇帝時，定鼎則寶雞之麥聯穗而生，治成則龍門之禾合仍而茂。」<sup>63</sup>嘉禾乃一莖多穗的小米，<sup>64</sup>為周朝盛世與君德之徵，《瑞應圖》亦載：「嘉禾，五穀之長，盛德之精也」，「周時嘉禾，三本同穗，貫桑而生，其穗盈箱。生於唐叔之國，比獻，周公曰：此嘉禾也，太和氣之生焉，此文王之德。乃獻文王之廟。」<sup>65</sup>明太祖熟稔《尚書》，曾親自箋註〈洪範〉，<sup>66</sup>嘉禾正是追摹盛世、比肩聖王的象徵，故特別重視嘉禾之獻。此外，亦與治國理念有關，所謂「為國之道，以足食為本。大亂未平，民多轉徙，失其本業。而軍國之費，所資不少，皆出於民，若使之不得盡力田畝，則國家資用何所賴焉」，<sup>67</sup>以足食為治國要領，思索戰亂、軍費對民生的沉重壓力，甚至影響邊境的治理。

<sup>61</sup> 明·陳治本等纂：〈勤民〉，《明太祖寶訓》，卷3，頁224-225。

<sup>62</sup> 明·不著撰人：《九朝談纂》，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子部第152冊（臺南：莊嚴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95），頁343。

<sup>63</sup> 明·嚴嵩：〈禾麥重祥頌有序〉，《鈐山堂集》，卷18，頁167。

<sup>64</sup> 屈萬里：〈書序集釋〉，《尚書集釋》，頁300，引孫星衍《尚書今古文注疏》：禾「即今之小米也」。

<sup>65</sup> 梁·孫柔之：〈嘉禾〉，《瑞應圖記》，收入《叢書集成續編》（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9），頁399。

<sup>66</sup> 明太祖對《尚書》的重視與應用，可參考連文萍：〈明代皇族的《尚書》講習〉，《書目季刊》45：2（2011.9），頁1-19。

<sup>67</sup> 明·陳治本等纂：〈勤民〉，《明太祖寶訓》，卷3，頁221。

## （一）洪武朝的嘉禾之獻與邊政管理

嘉禾之獻集中於洪武後期，如《國榷》記載洪武 29 年（1396）7 月癸未晉王進陽曲等縣嘉禾，<sup>68</sup>《實錄》著錄三筆，在洪武 28 年到 30 年間：

洪武二十八年九月己酉，代王桂進大同城北所產嘉禾一莖三穗者三本，二穗者二十一本。

洪武二十八年九月庚戌，今上進永清左衛龍門東屯嘉禾一莖三穗者二本，二穗者六本。

洪武三十年九月丁巳，晉王桐、代王桂各遣使進嘉禾，凡一百四十八本。<sup>69</sup>

以地點觀之，「陽曲」、「大同」屬山西，「永清左衛龍門」屬北平，皆為北方軍事重鎮，「龍門」尤可連結「天子」，即嚴嵩〈禾麥重祥頌〉所謂「治成則龍門之禾合仍而茂」。以進獻者觀之，三次獻禾皆與藩王有關，晉王朱桐（1358-1398）乃明太祖第三子，洪武 3 年（1370）受封晉王，就藩山西太原。代王朱桂（1374-1446）乃第十三子，原封豫王，就藩南昌，洪武 25 年（1392）改封代王，就藩於山西大同。所謂「今上」，為明成祖朱棣，乃第四子，洪武 3 年封燕王，13 年（1380）就藩北平。<sup>70</sup>

藩王駐守邊境，乃洪武朝邊政特色。洪武初期為防禦蒙古，軍事部署重在東北，邊境採取征伐制度，以行軍駐地。其後施行地方軍鎮制度，以駐軍鎮守屯田。隨著藩王長成、就藩，成為守邊的主力，與地方軍鎮制度並行。<sup>71</sup>明太祖關心邊境屯政，尤勤觀天象，憂慮邊境安寧，如洪武 30 年（1397）4 月辛卯觀天象，敕令晉王、燕王，避免胡人寇邊。5 月己巳，敕晉、燕、代、遼、寧、谷六王：「驗之歷代，天象若此者，邊戍不寧，雖非今應，二三歲間，灼有寇者。」<sup>72</sup>由此可知藩王的進獻嘉禾，除了顯示邊境安穩、屯墾富庶，尤在回應明太祖的繫心，以守邊之功爭取父親的認

<sup>68</sup> 明·談遷：《國榷》，卷 10，「太祖洪武二十九年」，頁 766。

<sup>69</sup> 明·胡廣等纂：《明太祖實錄》，卷 241，「洪武二十八年九月己酉」，頁 3503、「洪武二十八年九月庚戌」，頁 3504；卷 255，「洪武三十年九月丁巳」，頁 3678。

<sup>70</sup> 清·張廷玉等纂：〈代簡王桂〉，《明史》（臺北：鼎文書局，1979），卷 117，頁 951-952；〈晉王桐〉，卷 116，頁 946；〈成祖一〉，卷 5，頁 20。

<sup>71</sup> 明代北方邊政制度，可參考趙現海：〈洪武時期北邊軍事制度演變考察〉，《明代九邊軍鎮體制研究》（長春：東北師範大學中國古代史學科專業博士論文，2005），頁 30-68。

<sup>72</sup> 明·談遷：《國榷》，卷 10，「太祖洪武三十年」，頁 773、774。

可與垂愛。

值得注意的，前文討論的瑞麥之獻，多見於洪武朝初期，其後罕見著錄。但洪武 25 年（1392）12 月有山丹衛進瑞麥一莖二穗者凡十一本。<sup>73</sup>山丹衛位在甘肅，為西北邊防要地，洪武 23 年（1390）遼東已佔領，軍事重心移轉西北，山丹衛即設為指揮使司，隸屬陝西行都指揮使司，<sup>74</sup>洪武 24 年任命莊得為都指揮，「督農講武，是年麥秀一莖兩穗者四，次年一莖兩穗者十，人以為德政所致」。<sup>75</sup>故瑞麥出現於洪武末年，其意義與洪武初年的瑞麥之獻大有不同，係反映著經略西北有成與選任之得人，由此可見瑞應與國政的發展有關，進獻多有推動，並非純粹出於偶然。

## （二）嘉禾頌詩的相關考索

明太祖《御製集》所錄〈嘉禾〉詩有二，一為單首七律，一為七律組詩。二詩均未註明寫作時間，然結合前述討論，應為晚年之作。單首〈嘉禾〉如下：

嘉穀天教產朔方，戍官節奏入朝堂。穎同穗四昭佳氣，根一稽多獻瑞祥。宇內編成欣起舞，寰中士庶喜稱揚。賢臣若為生民理，時敘年豐永樂康。（卷 20，頁 26 上）

詩中「朔方」指北方，為嘉禾之產地，「戍官」指邊防指揮，「穎同穗四」乃一莖四穗，是此次嘉禾特色，較一莖二穗或三穗者稀罕，或即此詩詠歎之由。詩末諭示賢臣愛民重農，以得長久豐登。故此詩盛讚嘉禾，表達對北方邊務的重視與肯定，亦是地方軍鎮屯田之成效，惟此次進獻未見史籍的載錄。

另一首為組詩，由五首七律組成，可見明太祖書寫的費心慎重，欣喜之情躍然紙上：

宵衣垂老至時和，帝德恩沾地養禾。嘉瑞並臻人用足，禎祥疊見穀猶多。民

<sup>73</sup> 明·胡廣等纂：《明太祖實錄》，卷 223，「洪武二十五年十二月丁未朔」，頁 3259。

<sup>74</sup> 明·胡廣等纂：《明太祖實錄》，卷 204，「洪武二十三年九月庚寅」，頁 3051：「置陝西山丹衛」。明代陝西邊境經略，可參考趙陽陽：〈從腹地到邊疆：明代陝西鎮的形成與演變〉，《中國歷史地理論叢》32：2（2017.4），頁 56-63、136。

<sup>75</sup> 清·劉于義等纂：〈名宦三〉，《甘肅通志》，收入《文淵閣四庫全書》史部第 558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卷 32，頁 215。又見清·張廷玉等纂：〈瞿能〉附，《明史》，卷 142，頁 1080。

從教化心如水，官本條章法偃波。九有槩歡人稽首，黃童白叟盡謳歌。

又

日月光舒荷帝恩，嘉禾同穎至哉坤。四時均序黔黎樂，五穀豐登白叟言。姬氏岐山鳴彩鳳，軒轅仙圃長萸根。太平有象天垂佑，剖石刊碑紀頌文。

又

寒微受命荷穹蒼，宇宙經營事吉祥。嘉瑞穎禾垂地色，合歡連理運天香。洪荒禹跡新圖畫，太朴堯風舊憲章。因自乾來民受福，良臣世世子孫昌。

又

黃道天開日月明，福民嘉瑞獻吾京。自慙德薄誠無補，每獲年豐歌頌平。太史有才書吉兆，儒生執筆記休禎。民安太道天心悅，薄暮歸牛聽笛聲。

又

普天率土賀時雍，五穀豐登在處同。薄德日慙沾帝澤，雄才方可紀年豐。名儒載筆書時泰，隱士修心美世隆。旰食宵衣三紀過，揚波已息海無風。（卷20，頁17下-18下）

第一首以「宵衣」強調自身日夜勤於國事，天未明即披衣起身，欣喜時和年豐、嘉禾兆祥。第二首將嘉禾比作周朝將興時鳴於岐山的鳳凰，以及黃帝仙圃所長的萸莢，<sup>76</sup>以臻於前代盛世。第三首自言出身寒微，稟受天命，藉大禹治水之勤及《中庸》「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sup>77</sup>表出親政愛民如同《禹跡圖》再現，又能遵循堯舜之道，效法周文王武王之風。第四首強調每獲禎祥，皆載入史籍，並有儒臣歌頌，但自慙「德薄」，將嘉禾歸為「福民」之迭獻。第五首描摹「普天率土」時雍太平，再以「薄德」示謙遜，以「旰食宵衣」呼應第一首之勤政勤民。

全詩未明確繫年，然自謂「垂老」，復言「三紀」，指三十年，故此詩應作於洪武30年前後。檢視黃佐（1490-1566）《翰林記》有謂「二十九年，天下多嘉禾之瑞，學士劉三吾進〈嘉禾賦〉」，<sup>78</sup>考察劉三吾文集未見〈嘉禾賦〉，但有〈欽和嘉禾詩七

<sup>76</sup> 周·左丘明：〈周語〉，《國語》（北京：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17），頁30：「周之興也，鸞鸞鳴於岐。」鸞鸞即鸞鳳之別名。清·陳邦彥等纂：《康熙字典》（臺南：綜合出版社，1978），頁978，引《唐韻》：「萸莢，瑞草，堯時生于庭。」

<sup>77</sup> 宋·朱熹：〈中庸〉，《四書集注》，頁27。

<sup>78</sup> 明·黃佐：〈進呈書詩文序〉，《翰林記》（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66），卷11，頁145。

首〉可茲比對：

萬井連營萬竈烟，至和妙幹自皇天。禾呈佳瑞年登兆，人得耕桑地利便。金縷分芒香冉冉，銀緜抽穗色鮮鮮。宗藩所在如燕晉，永為皇家鎮極邊。

又

九天日月麗皇明，一統山河壯帝京。五穎連呈佳氣協，陸符端拱泰階平。朝家鴻造如斯溥，國運龍興信有徵。十數畫樓鳳城裏，春風鎮日筦絃聲。

又

伍位尊臨四海雍，一人慶衍萬方同。國家重道宗洙泗，文武興王自鎬豐。滄海深連恩澤被，華嵩高與治功隆。聖心如此尤謙抑，真有唐虞大朴風。

又

嘉禾屢進自宸恩，謙抑惟歸厚載坤。候應金穰先有兆，時調玉燭妙無言。露華凝作雙芒穗，和氣融為一本根。誕布皇仁徧寰宇，一皆實惠豈虛文。

又

彤庭微曙色蒼蒼，藩府頻來奏吉祥。露濕龍枝禾穗色，雲騰雞舌御爐香。萬官進賀趨丹陛，當宁臨朝在總章。天祐皇家賢士出，人人謇諤盡周昌。

又

聖德如天覆萬方，就中視遠若皇唐。至和已見連年稔，上瑞無先五穀祥。萬寶告成人蟻聚，連營足食士鷹揚。微臣忠愛無他願，但願年年天降康。

又

四序均調玉燭和，一苗五穗異常禾。天家雨露沾濡廣，帝室山河表裏多。豈是龍門皆沃壤，總由鴻造毓恩波。微臣鋪敘曾為賦，賦意惟宗屈宋謠。<sup>79</sup>

此詩乃和明太祖〈嘉禾〉之韻，<sup>80</sup>故知明太祖原詩應為七首七律的組合。劉三吾摹寫富麗、歌功頌德，「宗藩所在如燕晉，永為皇家鎮極邊」、「藩府頻來奏吉祥」、「至和已見連年稔」等句，可見此詩係針對洪武 28 年以來晉王、燕王藩府屢獻嘉禾而發，

<sup>79</sup> 明·劉三吾：〈欽和嘉禾詩七首〉，《坦齋劉先生文集》，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第 25 冊（臺南：莊嚴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96），頁 155。按：詩中「鷹揚」應作「鷹揚」。

<sup>80</sup> 劉三吾第一首押先韻，第六首押陽韻，然明太祖組詩二首已佚，無法比對。其餘第二首押庚韻：明、京、平、徵、聲（徵為蒸韻，可通韻），第三首押東韻：雍、同、豐、隆、風（雍為冬韻，可通韻），第四首押元韻：恩、坤、言、根、文（文為文韻），第五首押陽韻：蒼、祥、香、章、昌，第七首押歌韻：和、禾、多、波、歌，皆見於明太祖〈嘉禾〉組詩，但排列順序不一致。

又有「豈是龍門皆沃壤」，乃用燕王所獻龍門之嘉禾，雙關國土盡皆沃壤，切中明太祖繫心之所在，彰顯宗藩守邊、輔翼帝京的政策有成。至謂「一苗五穗異常禾」，乃因禾麥祥瑞常以數量多歧較勝，常見為二、三歧，多至五歧者最為奇異，可以薦於太廟。<sup>81</sup>此言「一苗五穗」至為罕見，但明太祖現存原詩只謂「嘉禾同穎」、「嘉瑞穎禾」，未有數量之標舉，史籍亦未見相關載錄，原因不明。

黃佐《翰林記》又記錄：「先是洪武二十八年九月庚戌，北平永清衛之龍門，有禾異莖同穗，上在潛邸遣使馳獻，太祖親御宸翰，賦長詩一篇以賜。上念手澤之存，摹勒於石，裝治成軸，分賜諸王及學士解縉等，又適有嘉禾之瑞，解縉獻〈嘉禾頌〉。」<sup>82</sup>可見明太祖針對永清衛龍門嘉禾寫有長詩，是否即此首七律組詩？解縉〈嘉禾頌〉序文有謂：

洪武二十有八年秋九月壬辰朔庚戌北平永清衛之龍門，禾有異莖同穗之祥，其三幹合為一仍三穗者二，二穗合為一仍二穗者六，是歲大熟。今上為藩王時，遣使來進，群上表賀，太祖聖神文武欽明啟運俊德成功統天大孝高皇帝，親御翰，為詩一章，以賜今上。其詩首言創業之艱，天命之不易，除暴禁亂之師，撫民致治之略。中言天賜豐登之屢，史書垂示之嚴，明堂禋薦之重。末示謙冲戒謹之意，為善不足之誠，大矜下民之惠，與民同樂之盛。心溢於言表，蓋不以嘉禾為可矜，而以為可懼，而思以自勉。聖不自聖，兢兢業業，足以垂訓於千萬年。今上皇帝服膺聖訓，念手澤之存，諷頌追維，不能自己。乃永樂三年九月朔旦，用摹勒於石，拓本裝治成軸，分賜諸王及近臣，於是臣縉亦得與賜焉。<sup>83</sup>

此序記錄獻瑞時地，以首、中、末三個詩段勾勒明太祖「長詩」內容，包括回顧創業、上天屢賜、謙遜戒慎三個重點，可見明太祖的嘉禾觀點，與前述瑞麥相同，然其文體較似歌行或古詩，並非組詩的樣貌。事實上明太祖此組律詩並不完整，加上

<sup>81</sup> 如「南陽薦瑞麥至五歧，薦太廟」。明·談遷：《國權》，卷14，「成祖永樂四年」，頁972。

<sup>82</sup> 明·黃佐：〈進呈書詩文序〉，《翰林記》，卷11，頁145。

<sup>83</sup> 明·解縉：〈嘉禾頌有序〉，《文毅集》，收入《文淵閣四庫全書》集部第1236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卷2，頁614。

他的書寫隨興，多不存稿，<sup>84</sup>詩作常有存佚問題，因此是否另有一首針對龍門嘉禾的歌行或古詩？仍有待尋索。

有趣的是，明成祖的儒臣楊士奇也獲賜明太祖〈嘉禾〉詩拓本，恭敬寫下〈謝賜嘉禾詩〉，詩序記載賞賜的情境：

永樂三年九月朔旦，上閱中秘書，得太祖聖神文武欽明啟運俊德成功統天大孝高皇帝御製〈嘉禾〉詩。聖孝深至，將垂示萬萬年，乃命摹刻以賜諸王廷臣。龍章玉刻，雲漢昭回，臣忝職侍從，均拜鴻恩，齋沐莊誦，有以窺見帝王功德之隆矣。<sup>85</sup>

楊士奇在詩序中稱明太祖為「太祖聖神文武欽明啟運俊德成功統天大孝高皇帝」，與解縉相同，寫作時間應甚接近，最值得注意的，他指出明太祖〈嘉禾〉詩係永樂3年明成祖閱讀宮廷藏書時獲得，故此詩有句「宸章隱中秘，至寶終明著」，頌讚〈嘉禾〉詩終於能被發掘彰顯。

考察楊士奇《東里續集》，又有〈恭題呂少卿欽和御製嘉禾詩韻後〉，乃呂升（?-1433）獲賜拓本而恭和明太祖〈嘉禾〉詩，楊士奇的題寫謂：「永樂初，太宗皇帝閱中秘書，得太祖皇帝所製〈嘉禾〉詩」，<sup>86</sup>再次說明〈嘉禾〉詩發掘經過。呂升之詩也倩請另一位儒臣楊榮品題，楊榮寫有〈題大理少卿呂升恭和御製嘉禾詩後〉謂：「〈嘉禾〉詩一章，太祖高皇帝御製也。永樂之初，太宗文皇帝始出墨蹟于中秘，俾勒石摹拓，頒賜廷臣，然聖心寶愛之至，由是拜賜者無幾焉」。<sup>87</sup>可見諸臣獲賜拓本，皆謂此首〈嘉禾〉出於「中秘」，並非如解縉所言洪武28年燕王獻禾時明太祖的賜詩。再考察《國權》，有謂：「北平永清衛之龍門嘉禾生，異莖同穗」，<sup>88</sup>未見著錄明

<sup>84</sup> 「且當萬幾之暇，時御翰墨，多不留藁。」宋濂：〈恭題御製文集後〉，明·朱元璋：《高皇帝御製文集》（嘉靖本），「附錄」，頁4下。

<sup>85</sup> 明·楊士奇：〈謝賜嘉禾詩有序〉，《東里集·東里續集》，收入《文淵閣四庫全書》集部第1239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卷55，頁410、411。

<sup>86</sup> 明·楊士奇：〈恭題呂少卿欽和御製嘉禾詩韻後〉，《東里集·東里續集》，卷16，頁576。按：呂升無文集存世，其詩未見。

<sup>87</sup> 明·楊榮：〈題大理少卿呂升恭和御製嘉禾詩後〉，《文敏集》，卷15，頁238。

<sup>88</sup> 明·談遷：《國權》，卷10，「太祖洪武二十八年」，頁760。

太祖賜詩之事。

這當中必有記憶或詮釋等問題，但解縉之說強調明太祖親自賜詩燕王，如同「以民相託」，有助於輔翼或強化其奪取政權的正當性，故永樂時《實錄》及萬曆時《翰林記》選載此事，嘉靖時陳建（1497-1567）《皇明通紀法傳全錄》亦謂：「九月，燕王進呈永清左衛龍門東嘉禾一莖三穗者二本，二穗者六本，上親製〈嘉禾〉詩賜之」，<sup>89</sup>故明太祖〈嘉禾〉詩深具政治意義，被塑造為明成祖一系的「新朝」瑞應。

其後，永樂朝迭有嘉禾之獻，且有接力續寫，如太子朱高熾（1378-1425）親撰〈嘉禾〉：「世治天心眷，年豐地盎多。已看呈瑞麥，又覩薦嘉禾。九穗涵仁德，連莖兆至和。邦家隆盛日，擊壤載謳歌。九穗涵仁德，連莖兆至和」。<sup>90</sup>宣德初年四川茂州守臣進獻嘉禾，明宣宗朱瞻基（1398-1435）諭以「朕何德以致此，其勿賀」，<sup>91</sup>但仍親撰〈嘉禾〉詩謂：「祖功宗德深培植，惟秉恭勤事繼承」，<sup>92</sup>其難掩喜悅，視嘉禾為天意與祖德的雙認證，表出帝業傳承的統緒。

## 五、甘露之祥與宮廷活動

甘露屬於大瑞，為天象之奇，《瑞應圖》謂：「露色濃甘者謂之甘露，王者施德惠則甘露降其草木」，又曰「甘露者，美露也。神靈之精，仁瑞之澤，其凝如脂，其甘如飴」。<sup>93</sup>甘露與瑞麥、嘉禾的進獻不同，常於冬日降臨於君王所在的宮苑或近郊，故能即刻傳布、取得。

<sup>89</sup> 明·陳建：《皇明通紀法傳全錄》，收入《四庫禁燬書叢刊補編》第10冊（北京：北京出版社，2005），卷11，頁178。

<sup>90</sup> 明·朱高熾：《御製詩集》（臺北：國家圖書館藏明洪熙元年內府刻本），卷上，頁13。

<sup>91</sup> 明·楊士奇等纂：《明宣宗實錄》（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66），卷68，「宣德五年秋七月戊申」條，頁1596。

<sup>92</sup> 明·朱瞻基：〈嘉禾〉，《大明宣宗皇帝御製集》，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第24冊（臺南：莊嚴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96），卷36，頁222。

<sup>93</sup> 梁·孫柔之：〈甘露〉，《瑞應圖記》，頁395。

## （一）洪武朝的甘露發現與君臣互動

洪武初年甘露降臨頗為頻繁，其中洪武2年（1369）10月天降甘露於鍾山，明太祖與諸臣討論甘露的符應，如睢稼謂「陛下敬恭天地，輯和民人，故嘉祥顯著」，魏觀（1305-1374）謂「陛下寬租賦、減徭役，百姓懽豫，神應之至，以此故也」，危素（1303-1372）謂「今甘露降于松柏，迺陛下尊賢養老之所致也」。諸臣引經據典，爭相表現，明太祖裁示謂：「卿等援引載籍，言非無徵，然朕心存警惕，惟恐不至，烏敢當此一或忘鑑戒而生驕逸，安知嘉祥不為災異之兆乎！」<sup>94</sup>萬曆本《寶訓》將此事錄於〈謙德〉章，<sup>95</sup>是知明太祖視甘露、瑞麥、嘉禾並無二致，皆追溯歷來瑞應文化傳統，表達警懼，以便趨吉避凶。

宋濂（1310-1381）〈天降甘露頌〉亦記錄降露經過：「洪武二年冬十月十有三日甲戌，膏露降于乾清宮後苑蒼松之上，皇帝特敕中官折示禁林諸臣」，其謂甘露降於乾清宮後苑，與前述史籍所載不同，其原因應係氣候因素，冬季清晨氣溫低，露水凝結於後苑及鍾山的松枝，甚為合理。重點是明太祖下令折取松枝，將甘露傳布欣賞，可見慶喜的意態，亦成為當日特殊的宮廷活動。文中，宋濂加入詮解，由甘露凝結如珠、肪白飴甘的樣貌，聯想「氐北有星名天乳，若明而潤，則膏露下焉。王者德格於上，恩覃於下，靈氛充牣，秘貺斯甄，此天人感應之恒理也」，<sup>96</sup>立論力求出新，又聯結傳統天人感應之理，展現學識與忠忱。

在獻瑞儀式中，儒臣的言說及詩頌多有角力的意味。《明史》著錄：「甘露降於鍾山，群臣以詩賦獻，帝獨褒魯」，<sup>97</sup>可見已演為瑞應競寫活動，明太祖曾予裁奪，特別褒揚曾魯（1319-1372）。考察《國榷》所載，此為洪武5年（1372）9月曾魯所撰〈鍾山甘露頌〉，<sup>98</sup>此文獲得明太祖褒揚，被視為重要宦蹟，獲載入史冊，可見瑞應詩頌被視為立言不朽，對朝廷及儒臣皆有重要意義。

<sup>94</sup> 明·胡廣等纂：《明太祖實錄》，卷46，「洪武二年十月甲戌」，頁0922。

<sup>95</sup> 明·陳治本等纂：〈謙德〉，《明太祖寶訓》，卷1，頁50-51。

<sup>96</sup> 明·宋濂撰：〈天降甘露頌〉，《鑾坡前集》，收入《宋濂全集》（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9），卷1，頁328。

<sup>97</sup> 清·張廷玉等纂：〈曾魯〉，《明史》，卷136，頁1050。

<sup>98</sup> 明·談遷：《國榷》，卷5，「太祖洪武五年」，頁476。

洪武 5 年 10 月甲申天降甘露於宮苑，乙酉復降於鍾山，劉崧〈進甘露詩十六韻〉詩序謂：

洪武五年壬子十月十一日甲申，甘露降于宮苑之松樹。乙酉時享太廟，上命採之以薦。是日復降於鍾山，上命侍臣分採之。既午，上御奉天殿門，出所得甘露，盛以金盤，冪以黃帕，徧示庭臣，仍有旨賜百官假一日往觀焉。越明日，大駕晨發，群臣雲從，躋攀林崖採覽，如脂如錫，甘美芳潤，信瑞應之大者也。又明日，禮部尚書陶凱而下三十有五人咸進頌賦，小臣兵部職方郎中崧謹頓首并拜獻長律一首。<sup>99</sup>

明太祖對上天連降甘露甚為欣喜，薦之太廟，又賜百官休假一日，君臣攀山採露，詩謂「丹陛傳天語，千官肅駿奔。草堂聯珮綬，鍾阜擁蹄轅」，可見盛況非常。除劉崧等人進獻頌賦，明太祖又命釋宗泐（？-1391）賦詩，其《全室外集》有五言排律〈應制賦甘露詩十二韻〉，其中「競采千官合，高擎眾騎叢。獻當青瑣闥，覆以碧紗籠」，<sup>100</sup>描繪當日官員競相採露、獻露情景。明太祖個人應有寫作，《御製集》錄有五言排律〈甘露〉，可惜此卷已佚。值得注意的，此次君臣採露同歡、賦詩相賀，為難得的宮廷盛事，充滿和諧昇平的盛世氛圍，卻未見於《實錄》、《寶訓》著錄，推測可能是有違謙德的考量。

其後甘露之降，劉基〈甘露頌〉序謂：「洪武四年十月，甘露降于鍾山，沾潤草木，瑩若凝脂，美猶醞醑。五年十有一月又降，今年仍降如初。臣聞《瑞應圖》曰：王者德至于天則甘露降。鍾山京國之鎮，帝業所基，而甘露每降于茲，則天之所以彰我皇帝之德而引國祚於悠久之意，豈不顯顯矣乎！昔者軒轅黃帝得瑪瑙之甕，甘露降之滿盈，黃帝食之而壽。今甘露連年屢降，則天之所以壽我皇帝於千萬歲之意，又豈不昭昭矣乎！」<sup>101</sup>劉基援引《瑞應圖》所載，指出連降甘露乃國祚綿長、君王長壽之兆，此說不同於瑞麥、嘉禾乃一二民家之瑞或邊境屯墾有成，而是符應著明

<sup>99</sup> 明·劉崧：〈進甘露詩十六韻有序〉，《槎翁詩集》，收入《文淵閣四庫全書》集部第 1227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卷 5，頁 399。

<sup>100</sup> 明·釋宗泐：〈應制賦甘露詩十二韻〉，《全室外集》，收入《文淵閣四庫全書》集部第 1234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卷 1，頁 791。

<sup>101</sup> 明·劉基：〈甘露頌并序〉，《誠意伯文集》，卷 20，頁 477-478。

太祖自我及身家，故其喜不自勝是可以想見的。

除此，瑪瑙甕的傳說也深得其心。傳說黃帝時丹丘國進獻瑪瑙甕，以之盛甘露，至堯時盈而不涸，曾分賜群臣。<sup>102</sup>宋濂〈御賜甘露漿詩序〉記錄，洪武6年（1373）正月丙午，明太祖在武樓之便閣，與近臣談論嘉祥之應，敕命中貴人取宮中所儲甘露，投入煉水二升，與儒臣共飲，明太祖曰：「此天地至和所凝也。卿等服之，去沉痾而衍遐齡。」<sup>103</sup>宋濂表達受賜之榮，特意將甘露接續黃帝道統，稱美盛德與福壽。以明太祖角度而言，乃是瑞應文化的應用，他複製「瑪瑙甕」傳說，由觀看、儲存、賜飲，經營著君臣和諧關係，所謂「卿等服之，去沉痾而衍遐齡」，有共好共壽之意，如同前文討論的〈瑞麥諭多方詔〉，期勉與民「共享豐年之樂」，皆可謂君德、治世的展示。

## （二）甘露論的書寫與省思

明太祖的瑞應書寫，亦有親身發現的禎祥。洪武8年（1375）11月18日於圓丘祭祀上帝，即發現甘露之降，特撰〈甘露論〉。<sup>104</sup>以文體而言，論乃議論，用於說理，曹丕（187-226）〈典論·論文〉謂：「書、論宜理」，明太祖喜歡說理教化臣民，故文集有〈神鬼有無論〉、〈三教論〉等闡述玄虛之見，〈時雪論〉、〈七曜天體循環論〉等議論氣候與天象，〈蜂蟻論〉、〈鼠嚙書論〉等發表生物觀點，<sup>105</sup>惟甘露乃祥瑞，特發以議論，值得探究。

此文以「論」為題，其實分作論與記二端，先議論對祥瑞應有的態度，再記述甘露的發現與感懷。其議論部分：

古今通言，世有禎祥、妖孽，其禎祥以應兆人，妖孽不善當之。雖聖人、愚

<sup>102</sup> 清·陳夢雷等纂：〈曆象彙編·乾象典〉，《數位古今圖書集成》網站，網址：<http://192.83.187.228/gitsnet/index.htm>（2023年5月1日上網）。

<sup>103</sup> 明·宋濂撰：〈御賜甘露漿詩〉，《翰苑別集》，收入《宋濂全集》，卷4，頁1019。

<sup>104</sup> 明·胡廣等纂：《明太祖實錄》，卷102，「洪武八年十一月甲戌」，頁1721。〈甘露論〉見明·朱元璋：《高皇帝御製文集》（嘉靖本），卷7，頁15上-16下。

<sup>105</sup> 諸文見明·朱元璋：《御製集》，卷14，惟此卷佚失。明·朱元璋：《高皇帝御製文集》（嘉靖本），卷10有收錄，可參見。

夫愚婦，莫不同心一志，好禎而惡妖。然嘉禎之心固篤，為善之心不厚，是以妖、禎反常者有之，如其道者有之。昔春秋孔子覩麟而絕筆，舜得鳳凰來儀天下安。近代，有元將末而河水清，至正年間甘露降。靜思禎祥、妖孽，可不令人日夜憂惶！所以憂惶者，正為鬼神之機，人莫可測。若以必妖而必禎，其禍福兩忘者有之，若以禎而非我之兆，或福漸臻；若以妖之為害，必逼其身，肯日新其己，其禍消矣。故前代忠臣碩士，若有妖魅之作，必致君宵衣旰食以回天意。若見禎祥之見，急奏，恐兆他人，非天恩於己也，特以警省，務在四海咸安，誠為良法也。

此段頗為冗雜，禎、妖二字複出，缺乏剪裁，但「好禎而惡妖」論點很鮮明。其所以誠惶誠恐，乃因鬼神之機難測，恐天恩不兆於己，或恃祥忘危反生災禍，故深思禎祥之意，指導臣下警省，務求四海咸安。接著敘述發現甘露的經過與省思：

即今洪武八年冬十一月十有八日，詣齋宮，祀上帝於圜丘。當日省視壇場，道經松下，忽見森松極杪，露水凝枝，垂懸上下，有若明珠。初將以為晨露未消，倏蜜蜂交雜，致吾忽然而省，此必天垂甘露矣。試採而啖之，入口甘如錫糖，誠然天恩下墜，未審禎兆何因而何人矣。特詔諸臣從行者，共採而食之，更敕儒臣以歌詠其來。去後不兩時，人各以詩文來獻，符禎稱祥者比比皆然。事屬無憂，豈不賴禎以忘危乎！朕所以聞祥而憂，覩禎而患，以其近日以來，雞鳴半夜，乖逆之氣，不數日見於晨申。況土木之工並作，不得已而為之。此皆上帝之所惡，惟恐不答，心驚晝夜，如履薄冰，豈敢以甘露之降禎祥，以為必然者也！

此段記述巡視壇場，忽見松枝甘露凝結如珠，有蜜蜂交雜，隨即與臣下採而共食，並敕令儒臣歌詠。又謂「聞祥而憂，覩禎而患」，深恐自己落入「好禎而惡妖」之窠臼，故尋思自省，領悟必是近日宮廷改建，<sup>106</sup>土木之工為上帝所惡。

圜丘為祭祀昊天上帝之祭壇，明初以圜丘、方丘、宗廟、社稷、朝日、夕月、先農為大祀，洪武元年（1368）建圜丘於南京正陽門外，鍾山之陽，洪武4年又有改築。<sup>107</sup>昊天上帝必由君王親祭，不得代祭，故此文表出時、地、事三個特殊性，

<sup>106</sup> 「九月戊午朔，辛酉，改建大內宮殿。」明·談遷：《國權》，卷6，「太祖洪武八年」，頁526。

<sup>107</sup> 清·張廷玉等纂：《志二十三·禮一》，《明史》，卷47，頁327、328。

「時」為祭祀昊天上帝之日，「地」為圓丘，「事」為親身發現甘露，相較於宮苑、鍾山之降露，更代表昊天上帝的當面垂示，因此歡喜頌讚之餘，特別的憂懼猜疑。

明太祖書寫圓丘甘露，也曾以甘露命題試士。洪武 15 年（1382），在學士吳沉（?-1386）推薦下，徵得儒土方孝孺（1357-1402）至京。明太祖喜其舉動端整，謂皇太子曰：「此莊士也，當老其才以輔汝」，試以〈靈芝甘露論〉。其實洪武時期未有靈芝進獻紀錄，但民間常有，明太祖〈大祀〉詩「松凝甘露天垂祐，山滿靈芝民福延」，<sup>108</sup>以甘露、靈芝並舉，可見甚為熟悉。方孝孺應試有謂：

……臣聞天地於禎祥之類，非惟見於物，亦間見於人，故物有非常之質，人有非常之才。非常之物，僅可為太平之徵；非常之才，實可以致太平之盛。是以聖人尤貴之重之。德可以善俗，行可以化民，使人見之而喜，即之而慕，巋然傑然，為禎祥於天下國家者，此真人之靈芝甘露也。天地之佑聖人者，意其在此，豈徒見於山川之間而已哉！<sup>109</sup>

方孝孺將「非常之才」比作「人之靈芝甘露」，籲請君王珍視善用，觀點新穎，足以輔翼聖聽，明太祖甚為激賞，曰：「異人也，吾不能用，留為子孫光輔太平足矣。」<sup>110</sup>可見明太祖以甘露禎祥為題，品鑒人才，對儒臣書寫的期待，不只在歌功頌美，尤在識見及積極用世之能。

甘露之祥在明太祖身後多有影響，值得注意的是降露地點。如永樂 17 年（1419）11 月 17 日至 20 日，甘露連降於明太祖孝陵之松柏，楊士奇〈甘露表〉記錄謂：「此國家之上瑞，今降于孝陵，誠本皇上大德，上感通于天地祖宗，下廣被于天下生民所致，以隆皇上萬萬年之洪福，國家萬萬年之太平。」<sup>111</sup>甘露出於明太祖陵墓，被視為明成祖之德感通上天與祖宗，明仁宗時為太子，亦親撰〈甘露〉詩：「吾皇德與天合，甘露降于孝陵。松柏光涵芳潤，萬年永協休徵。」<sup>112</sup>可見甘露如同嘉禾，足

<sup>108</sup> 清·張廷玉等纂：〈大祀〉，《明史》，卷 20，頁 6 下。

<sup>109</sup> 明·方孝孺：〈靈芝甘露論〉，《遜志齋集》，收入《文淵閣四庫全書》集部第 1235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卷 7，頁 214-215。

<sup>110</sup> 明·過庭訓：〈方孝孺〉，《本朝分省人物考》第 62 冊，卷 54，頁 11。

<sup>111</sup> 明·楊士奇：〈甘露表〉，《東里集·東里續集》，卷 44，頁 273。

<sup>112</sup> 明·朱高熾：〈甘露〉，《御製詩集》，卷上，頁 24 上。

以塑造君德，掩飾覬覦天下的企圖，也暗寓政權得自上天與祖意的正當性。其後，明世宗熱中祥瑞，甘露降於承天園陵松樹，特賜予寵臣夏言（1482-1548）。田藝蘅（1524-1591）記錄此事，即歷數開國以來洪武2年至8年的甘露，推崇御製〈甘露論〉，又引述宋濂〈御賜甘露漿詩序〉，<sup>113</sup>可見明太祖君臣的甘露書寫，已成為後世追慕的重要垂範。

## 六、結論

就瑞應的文化傳統來看，明太祖的觀點並不新穎，但對新建的王朝，他的相關詔諭詩文足以創制與定位，成為敬天法祖的榜樣。以下由三端總結全文：

其一，明太祖對於瑞應的觀看與應用，來自學習與承繼前代文化傳統，國家瑞應認證制度也由此建立。其與儒臣講論瑞應之意義，品評頌讚詩文之高下，意欲重現盛世書寫與榮光。又注意災祥一體兩面，展現憂患之思，要求君臣同心，居安思危，以求國祚永保。其藉瑞應品鑒人才，對於儒臣書寫的期待，不只在歌功頌美，亦在識見及用世之能。

其二，明太祖書寫以瑞麥、嘉禾最多，顯示以足食為先的治國理念，反映出當日瑞應進獻是由南而北的動態過程，由立國之初江浙安徽諸地百姓進獻瑞麥，到洪武後期北方邊官及藩王的進獻嘉禾，以及產自甘肅的瑞麥，標誌著治國經略的重點，意欲呈現國土經營擴充與邊境督農講武的成效。其所記錄甘露之祥，多出現於洪武初期，攸關宮廷治理與君臣關係，藉由賜假百官、登山採露、施恩賜飲，營造盛世的氛圍。以此觀之，瑞應與國政關係密切，攸關皇權的建立與穩固，並非純粹出於偶然。

其三，明太祖瑞應詔諭詩文傳達謙虛自牧的態度，以符合儒家君德。搭配儒臣

---

<sup>113</sup> 明·田藝蘅：〈甘露〉，《留青日札》，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子部第105冊（臺南：莊嚴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97），卷9，頁228-229。

的頌讚書寫，強調政權天授，冀得人心順服。其影響深遠，後世君臣各取所需加以詮解與運用，作為勤民、謙德、禁諂諛、弭災異的典範，寄寓對君王的美好期待，期請敬天法祖，切莫倚仗皇權天授而恣意妄為。最特別的是，永樂時藉重編《實錄》，多次增益改寫洪武時期瑞應令諭紀錄，又聯結燕王獻禾與明太祖〈嘉禾〉詩，或標舉太祖孝陵出現甘露，意欲結合天意與祖意，認證皇權轉移的正當性，已超乎明太祖詔諭詩文的原始立意，巧妙塑造出明成祖一系的「新朝」瑞應，成為明代宮廷政治文化的鮮明印記，其意義耐人尋味。

## 附錄：明太祖時期重要祥瑞一覽表

時間	祥瑞	太祖回應	相關著錄
吳元年 4 月	應天府句容縣進瑞麥	口諭	實錄卷 23 寶訓（洪武本）卷 3 祥異 寶訓（萬曆本）卷 3 勤民
洪武 2 年 4 月癸巳	淮安寧國鎮江揚州台州等各進瑞麥	口諭 瑞麥諭多方詔	實錄卷 41 寶訓（萬曆本）卷 1 謙德
洪武 2 年 10 月甲戌	甘露降於鍾山	口諭	宋濂天降甘露頌 實錄卷 46 寶訓（萬曆本）卷 1 謙德
洪武 3 年 5 月丁巳	鳳翔府寶雞縣進瑞麥	口諭	劉基瑞麥頌 實錄卷 52 寶訓（萬曆本）卷 1 謙德 國榷卷 4
洪武 4 年 4 月辛丑、 戊申、己酉	五色雲見		實錄卷 64
洪武 4 年 5 月辛酉	應天府江寧縣進白兔		實錄卷 65
洪武 4 年 10 月	甘露降於鍾山		劉基甘露頌
洪武 5 年 6 月辛巳	五色雲見		實錄卷 74
洪武 5 年 6 月癸卯	應天府句容縣進嘉瓜	嘉瓜贊	宋濂嘉瓜贊 實錄卷 74 寶訓（萬曆本）卷 1 謙德 禮部志稿卷 88 獻瑞
洪武 5 年 9 月	鍾山甘露		國榷卷 5 曾魯鍾山甘露頌
洪武 5 年 10 月甲 申、乙酉	甘露降於宮苑、鍾山		劉崧甘露詩十六韻 宗泐甘露詩十二韻
洪武 5 年 11 月	甘露降於鍾山		劉基甘露頌
洪武 5 年 11 月丙戌	河南民進白兔	口諭	實錄卷 75
洪武 6 年正月丙午	君臣共飲甘露		宋濂御賜甘露漿詩序
洪武 6 年 6 月丁丑	五色雲見		實錄卷 83
洪武 6 年 6 月壬午	盱眙縣進瑞麥	口諭	實錄卷 83
洪武 6 年 7 月癸卯	五色雲見		實錄卷 83
洪武 8 年 10 月庚戌	五色雲見		國榷卷 6
洪武 8 年 11 月甲戌	甘露降於南郊（園丘）	口諭 甘露論	劉基甘露頌 實錄卷 102 寶訓（萬曆本）卷 1 謙德 國榷卷 6
洪武 10 年 7 月	嘉粟降於園丘	嘉粟歌	

洪武 11 年 8 月甲寅	高郵州進白兔		實錄卷 119
洪武 12 年正月己未	羽林衛進白兔		實錄卷 122
洪武 14 年 12 月	甘露降於鍾山百官賀		實錄卷 140
洪武 18 年 4 月 癸巳、乙未	五色雲見、再見	口諭	實錄卷 172 寶訓（萬曆本）卷 1 謙德 禮部志稿卷 1 卻賀訓
洪武 21 年 5 月乙酉	五色雲見	口諭	實錄卷 190 寶訓（萬曆本）卷 1 謙德 國榷卷 9
洪武 25 年 12 月丁未	山丹衛進瑞麥		實錄卷 223
洪武 28 年 7 月戊戌	汝寧府確山縣野蠶成 繭	口諭	實錄卷 239 寶訓（萬曆本）卷 1 謙德 國榷卷 10
洪武 28 年 9 月己酉	代王進大同嘉禾		實錄卷 241
洪武 28 年 9 月庚戌	燕王進永清左衛龍門 嘉禾		解縉嘉禾頌 實錄卷 241 國榷卷 10
洪武 29 年 7 月癸未	晉王進陽曲等縣嘉禾		國榷卷 10
洪武 30 年 9 月丁巳	晉王、代王各進嘉禾		實錄卷 255

## 徵引文獻

### 一、原典文獻

- 周·左丘明：《國語》，北京：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17。
- 漢·王充：《論衡》，收入《文淵閣四庫全書》子部第 862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
- 漢·董仲舒：《春秋繁露》，收入北京圖書館古籍出版編輯組編：《北京圖書館古籍珍本叢刊》經部第 2 冊，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88。
- 漢·劉珍等纂：《東觀漢記》，收入《文淵閣四庫全書》史部第 370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
- 梁·孫柔之：《瑞應圖記》，收入《叢書集成續編》，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9。
- 唐·李林甫等纂，陳仲夫點校：《唐六典》，北京：中華書局，1992。
- 宋·朱熹：《四書集注》，臺北：學海出版社，1982。
- 明·不著撰人：《九朝談纂》，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子部第 152 冊，臺南：莊嚴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95。
- 明·方孝孺：《遜志齋集》，收入《文淵閣四庫全書》集部第 1235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
- 明·王禕：《王忠文集》，收入《文淵閣四庫全書》集部第 1226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
- 明·田藝蘅：《留青日札》，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子部第 105 冊，臺南：莊嚴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97。
- 明·申時行等纂：《明會典》，收入《文淵閣四庫全書》史部第 617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
- 明·朱元璋：《大明太祖皇帝御製集》，北京：國家圖書館藏明鈔本。
- \* 明·朱元璋：《大明太祖皇帝御製集》，臺北：故宮博物院藏內府朱絲欄鈔本。
- 明·朱元璋：《高皇帝御製文集》，臺北：國家圖書館藏明嘉靖 14 年徐九臯江都刊本。

- 明·朱高熾：《御製詩集》，臺北：國家圖書館藏明洪熙元年內府刻本。
- 明·朱高熾：《天元玉曆祥異賦》，臺北：大塊文化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20。
- 明·朱瞻基：《大明宣宗皇帝御製集》，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第24冊，臺南：莊嚴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96。
- 明·宋濂著：《宋濂全集》，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9。
- \*明·俞汝楫：《禮部志稿》，收入《文淵閣四庫全書》史部第597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
- \*明·胡廣等纂：《明太祖實錄》，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66。
- 明·徐階等纂：《明世宗實錄》，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66。
- 明·陳子龍：《明經世文編》，收入《四庫禁燬書叢刊》集部第27冊，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
- \*明·陳治本等纂：《明太祖寶訓》，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86。
- 明·陳建：《皇明通紀法傳全錄》，收入《四庫禁燬書叢刊補編》第10冊，北京：北京出版社，2005。
- 明·黃佐：《翰林記》，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66。
- 明·楊士奇等纂：《明宣宗實錄》，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66。
- 明·楊士奇：《東里集·東里續集》，收入《文淵閣四庫全書》集部第1239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
- 明·楊榮：《文敏集》，收入《文淵閣四庫全書》集部第1240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
- 明·解縉：《文毅集》，收入《文淵閣四庫全書》集部第1236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
- \*明·詹同等纂：《明太祖寶訓》，收入《皇明修文備史》，北京：國家圖書館藏明鈔本。
- 明·過庭訓：《本朝分省人物考》，收入《四庫禁燬書叢刊》史部第60-62冊，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

- \* 明·劉三吾：《坦齋劉先生文集》，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第 25 冊，臺南：莊嚴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96。
- \* 明·劉基：《誠意伯文集》，收入《文淵閣四庫全書》集部第 1225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
- 明·劉崧：《槎翁詩集》，收入《文淵閣四庫全書》集部第 1227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
- \* 明·劉崧：《槎翁全集》，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第 24 冊，臺南：莊嚴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96。
- 明·談遷：《國權》，臺北：鼎文書局，1978。
- 明·鄭曉著，李致忠點校：《今言》，北京：中華書局，1984。
- 明·嚴嵩：《鈐山堂集》，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第 56 冊，臺南：莊嚴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96。
- 明·釋宗泐：《全室外集》，收入《文淵閣四庫全書》集部第 1234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
- 清·袁枚：《袁枚全集》，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3。
- 清·張廷玉等纂：《明史》，臺北：鼎文書局，1979。
- 清·陳邦彥等纂：《康熙字典》，臺南：綜合出版社，1978。
- 清·陳夢雷等纂：《古今圖書集成》，《數位古今圖書集成》網站，網址：<http://192.83.187.228/gjtsnet/index.htm>（2023 年 5 月 1 日上網）。
- 清·趙翼：《二十二史劄記》，臺北：世界書局，1968。
- 清·劉于義等纂：《甘肅通志》，收入《文淵閣四庫全書》史部第 558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
- 清·羅石麟等纂：《山西通志》，收入《文淵閣四庫全書》史部第 547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

## 二、近人論著

- \* 石守謙：〈元文宗的宮廷藝術與北宋典範的再生〉，《中國文化研究所學報》65

- (2017.7), 頁 97-138。
- 包遵彭：〈明太祖及其文章——為明太祖御製文集影印出版作〉，收入明·朱元璋：《明太祖御製文集》，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65，頁 1-10。
- 李若晴：《玉堂遺音：明初翰苑繪畫的修辭策略》，杭州：中國美術學院出版社，2012。
- 李若晴：〈瑞應圖書與繪畫考略〉，《中國國家博物館館刊》2016：9（2016.9），頁 84-99。
- 李峰：〈朱元璋與祥瑞：論封建帝王的憂患意識〉，《瀋陽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16：1（2014.2），頁 125-128。
- 周致元：〈洪武時期的農業自然災害和救災措施〉，《中國農史》19：2（2000.5），頁 18-24。
- 孟兆鑫：《災異祥瑞與殿試策問：嘉靖時期政治生態研究》，西安：西北大學中國史學科專業碩士論文，2019。
- 屈萬里集釋：《尚書集釋》，臺北：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1983。
- 胡德生：〈中國吉祥：中國古代祥瑞觀念的興起、演化和主要門類〉，《紫禁城》163（2008.8），頁 76-119。
- 連文萍：〈明代皇族的《尚書》講習〉，《書目季刊》45：2（2011.9），頁 1-19。
- 連文萍：〈題畫與政治——明太祖題畫詩文的考察〉，《臺大中文學報》82（2023.9），頁 107-164。
- 郭嘉輝：〈略論《大明太祖皇帝御製集》及其史料價值〉，《中國文化研究所學報》61（2015.7），頁 171-189。
- 陳磬：《古讖緯研討及其書錄解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
- 楊永康：〈洪武七年官修《皇明寶訓》史料價值初探〉，《史學史研究》2008：3（2008.9），頁 86-97。
- 萬明：〈明代詔令文書研究——以洪武朝為中心的初步考察〉，《明史研究論叢》8（2010.7），頁 1-35。

趙現海：《明代九邊軍鎮體制研究》，長春：東北師範大學中國古代史學科專業博士論文，2005。

趙陽陽：〈從腹地到邊鎮：明代陝西鎮的形成與演變〉，《中國歷史地理論叢》32：2（2017.4），頁 56-63、136。

劉言：《「祥瑞」與明代政治》，長春：東北師範大學明清史學科專業碩士論文，2012。

劉潔：〈漢代祥瑞文化與「天人感應」說之關係〉，《文博》2009：4（2009.7），頁 53-58。

\* 錢穆：《中國學術史思想論叢（六）》，臺北：東大圖書股份有限公司，1985。

〔日〕山根幸夫：〈明太祖と寶訓〉，收入東方学会編：《東方學會創立五十周年記念東方學論文集》，東京：東方学会，1997，頁 1157-1170。

〔加〕卜正明著，方駿等譯：《縱樂的困惑——明代的商業與文化》，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4。

〔美〕巫鴻著，李清泉等譯：《中國古代藝術與建築中的「紀念碑性」》，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

（說明：書目前標示\*號者，已列入 Selected Bibliography）

## Selected Bibliography

- [Ming] Chen Zhi Ben, *Ming Tai Zu Bao Xun* [The Family Instructions of Ming Tai Zu] (Taipei: Student Book Co., 1986).
- [Ming] Hu Guang, *Ming Tai Zu Shi Lu* [The Record of Emperor Tai Zu of Ming Dynasty] (Taipei: Institute of History and Philology, Academia Sinica, 1966).
- [Ming] Liu Ji, *Cheng Yi Bo Wen Ji* [Collected Works of Liu Ji], included in *Wen Yuan Ge Si Ku Quan Shu* [Wen Yuan Ge Edition of the Complete Library of the Four Treasuries] Literature Section, Vol. 1225 (Taipei: The Commercial Press, 1983).
- [Ming] Liu San Wu, *Tan Zhai Liu Xian Sheng Wen Ji* [Collected Works of Liu San Wu], included in *Si Ku Quan Shu Cun Mu Cong Shu* [Wen Yuan Ge Edition of the Complete Library of the Four Treasuries] Literature Section, Vol. 25 (Tainan: Solemn Culture Business Co., Ltd., 1996).
- [Ming] Liu Song, *Cha Weng Quan Ji* [Collected Works of Liu Song], included in *Si Ku Quan Shu Cun Mu Cong Shu* [Wen Yuan Ge Edition of the Complete Library of the Four Treasuries] Literature Section, Vol. 24 (Tainan: Solemn Culture Business Co., Ltd., 1996).
- Qian Mu, *Zhong Guo Xue Shu Shi Si Xiang Lun Cong (Liu)* [Collected Essays on Chinese Intellectual History: Volume Six] (Taipei: The Grand East Book Co., Ltd., 1985).
- Shih Shou Chien, "The Court Art of Tugh Temür and the Regeneration of Northern Song Paradigms," *Journal of Chinese Studies* 65 (Jul. 2017.), pp. 97-138.
- [Ming] Yu Ru Ji, *Li Bu Zhi Gao* [Draft to Official Treatise on the Ministry of Rites], included in *Wen Yuan Ge Si Ku Quan Shu* [Wen Yuan Ge Edition of the Complete Library of the Four Treasuries] History Section, Vol. 597 (Taipei: The Commercial Press, 1986).
- [Ming] Zhan Tong, *Ming Tai Zu Bao Xun* [The Family Instructions of Ming Tai Zu] included in *Huang Ming Xiu Shi Bei Shi* [Drafts for Compiling History Books] (Beijing: the Manuscript Copy Kept in National Library of China).

[Ming] Zhu Yuan Zhang, *Da Ming Tai Zu Huang Di Yu Zhi Ji* [Collected Works of Ming Tai Zu] (Taipei: the Manuscript Copy Kept in The National Palace Museum).

